

明代泰山道教鼎盛期規模研究*

朱學斌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

張 治

獨立學者

泰山道教在明初高壓宗教政策約束下備受打擊，現存的幾千方泰山石刻尚未發現明初的道士題名相關記錄，道士人數局限於百人以內。正統（1436-1449）至正德（1506-1521）年間，明廷宗教政策搖擺不定。由於成化朝（1465-1487）濫發度牒，全國道士數量明顯增加，泰山道士亦得以擴充。嘉靖十八年（1539）後鬻牒成為規制，明廷不再控制僧道人數，解決了許多寺觀的傳承問題。泰山道教到了萬曆（1573-1620）、天啟（1621-1627）兩朝發展更熾，其道士數量盛於往常。崇禎年間（1628-1644）泰山道教備受摧殘，情況直到清朝統一全國之後方有好轉。

本文選取嘉靖年間（1522-1566）成書的《泰山志》和萬曆年間成書的《泰安州志》與《岱史》為切入點，揀選文獻記載相對豐富的嘉靖至萬曆時期作為明代泰山道教鼎盛期的研究樣本，一方面對其進行相對共時的規模量化與推導，另一方面也與明代泰山道教前後其他階段進行歷時對比分析。本文不僅吸收各類山志、地方志及相關文獻，還充分利用現有的泰山金石資料，以各類碑記（包括碑陰題名）、墓碑、塔銘、鐘銘等作為依據，且有不少是來自於著者的訪碑實錄而非二手文獻。本文對明代不同時期的道廟發展沿革情況進行了全面梳理，兼以論證其歸屬道派，並列舉了影響明代泰山道士生存的重大事件，從而對明代泰山道教鼎盛期的規模有了較為完整的認識。本研究對瞭解明代道教宗派的發展與變遷具有重要價值，呈現了相對明晰的明代泰山道教圖景。

關鍵詞：明代泰山 明代道教 道廟規模 泰山金石 道教教團

一、引言

明代泰山雖有山志，如汪子卿《泰山志》、袁檜《泰山菟玉集》、查志隆《岱史》等，但對於寺觀大多僅記載其建置、沿革、修繕等項，對於住觀道士很少敘述。清代泰山的山志，如唐仲冕（1753–1827）《岱覽》、聶欽《泰山道里記》等，對於寺觀描述體例亦相仿。無論泰山志之體裁採用「志」體還是「覽」體，對於寺觀道士規模的記載都非常簡略。後世關於泰山道教之專著論文雖有所涉及，但多流於泛泛。因此目前關於明代泰山道士規模的研究尚有很大探討空間。

明代泰山道教規模研究的困難主要在於以下幾點：

一是**傳世檔案文獻的散佚**。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廷對僧道已經實行《周知冊》登記管理：「命僧錄司造周知冊，頒于天下僧寺」，¹此後亦進行多次統計，但明代禮部關於全國各地僧道的黃冊資料早已亡佚，迄今尚未發現有檔案材料存世。目前中國第一歷史博物館藏有清代乾隆三年（1738）禮部黃冊，其中記載泰安縣有僧165人，尼僧58人，全真道士382人，火居道士16人；另外，東平、平陰、肥城等州縣共有僧道五百餘人。²明代州縣一級每年也需成冊上報僧道更替身故事宜，《新官軌範·民情第四》：「僧道徒弟，必須告官查勘無碍，方許收養。若收各縣人，亦要附他本名下，遇有死亡，隨追度牒。每年終，將事故度牒數送上司，仍付簿明白備照。」³

* 本文為中國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泰山編年通史」（項目號：16FZS050）階段性成果之一。本文在寫作修改的過程中充分吸收了周郢、孫家鋒、許蔚、袁明英等老師和匿名評審老師的寶貴建議，在此由衷致謝。

- 1 黃彰健校勘，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實錄》（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明太祖實錄》，卷二二三，洪武二十五年閏十二月十八日條，頁3268。後文引明代實錄皆來自該版本。
- 2 乾隆三年禮部黃冊抄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研究統計可見秦國師：〈山東全真教的教團規模、分枝岔派與地域分佈（1368–1949）〉，《全真道研究》第三輯（濟南：齊魯書社，2014年），頁188–247。
- 3 佚名：《新官軌範》，收入《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編：《官箴書集成》（合肥：黃山書社，1997年），第1冊，頁744。

可惜明代禮部僧道黃冊及地方僧道檔案迄今未有發現存世的版本，導致目前學界仍然難以統計泰山道教教團規模的準確數值。對於檔案文獻宗教從業者相關統計的缺失，法國漢學家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遺憾地指出：「至於非國家檔案，特別是寺廟和行會的檔案，要麼已經亡佚，要麼仍然無法獲得。迄今為止，尚無學者接觸到大量此類資料。」⁴

二是泰山金石材料的損毀。泰山的古建築及其相關金石材料經常毀於兵燹水火：弘治八年（1495）岱頂碧霞靈應宮毀於火災；⁵嘉靖二十六年（1547）冬，東嶽廟災，殿宇、廊廡，以及館驛、齋居、門闈、樓觀蕩然一空。僅存後寢三殿與炳靈、延禧二宮。⁶萬曆二十一年（1593）大學士王錫爵（1534–1611）所撰〈東嶽碧霞宮祝釐碑〉在乾隆初毀於火災。萬曆二十二年（1594）會真宮火災「刻無所附」；⁷民國三十二年（1943）岱下靈應宮重修時百餘塊碑刻被毀，⁸導致其地現存碑刻竟罕見明碑，相關信息蕩然無存。

三是未能充分結合紙面文獻與實地調查的成果。雖然文獻材料及金石材料受條件所限缺失比較嚴重，但道士記載並非完全闕如。通過實地考察可知當地許多金石材料出現了不少道士題名，金文材料例如岱廟存原天書觀鐵塔、王母池現存鐵鐘、⁹遙參亭照妖鏡等銘文中都有道士名錄，石刻材料例如三陽觀、隱仙觀、四陽庵等道觀的碑文記載了不少道士。如對這些道士題名進行系統整理，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相關文獻檔案材料及金石材料不足的缺陷。

本文所討論的明代泰山「道教教團」既有全真道士，也包括正一

4 Vincent Goossaert, "Counting the Monks: The 1736–1739 Census of the Chinese Clergy," *Late Imperial China* 21.2 (2000): 40.

5 徐溥：〈重修碧霞靈應宮記〉，碑在水簾洞東北。邵珠峰：《泰山神廟劇場考》（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9年），頁145–146。

6 李欽：〈東嶽廟記〉，《泰山菟玉集》，卷一，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集部，第313冊，頁12。

7 孫星衍：《泰山石刻記》，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臺北：新文豐，1986年），第26冊，頁13。

8 朱宏偉：〈《重修靈應宮碑記》考略〉，《岱宗學刊》2004年第3期，頁59–60。

9 本文所用王母池鐵鐘銘文為泰山周郢先生所揭，承蒙惠贈圖片，特此感謝。

道士。火居道士及不住觀的清修道士都在「道教教團」的統計範圍內。

二、明代泰山道教「泰山」的區域概念

明朝立國之後，泰安州改隸濟南府（廢除其直隸州建置），原附郭奉符縣不再單獨設縣而併入州治，萊蕪縣改屬濟南府。洪武二年（1369）七月，長清縣改屬濟南府；洪武三年（1370），萊蕪縣又改隸於州。此後泰安州只領萊蕪、新泰二縣，延續整個有明一代。¹⁰

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1328–1398）詔設道錄司以掌天下道教。府設道紀司，都紀一人，從九品。州置道正司，道正一人，未入流。縣設道會司，道會一人，未入流。泰安州設道正司於會真宮（後移於岱廟），設僧正司於冥福寺，分別管理道、佛事務。¹¹ 本文「泰山道教教團」指明代泰安州道正司州屬直轄的道觀道士及散居道士，不包括泰安州所轄萊蕪、新泰二縣道會司管轄的道士。按照明初頒布的有關道教管理規定，顯然雲遊、掛單及火居道士都在道正司、道會司監督管理之下。

10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四一，〈地理志〉，頁939–940；葉圭綬撰，王汝濤、唐敏、丁余善等注：《續山東考古錄》（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年），頁216；周振鶴主編，郭紅、靳潤成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明代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52–55。

11 孟昭水校點集注：《岱覽校點集注》（濟南：泰山出版社，2007年），上篇，頁4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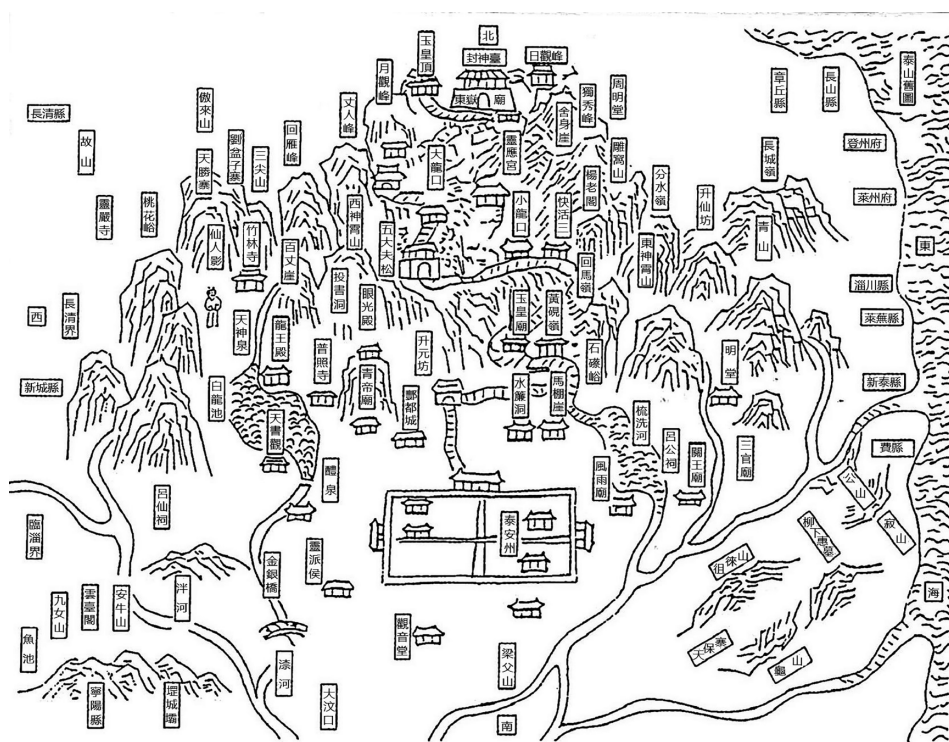


圖 1 明代泰山圖

泰山的地理範圍目前學界有多種觀點，計有 426 平方公里說，700 平方公里說，1 萬平方公里說，2.5 萬平方公里說，3 萬平方公里說。¹² 在具體研究中，視研究物件的不同，「泰山」這個區域概念也有所變化。如袁明英《泰山石刻》、周郢《泰山編年通史》中的泰山都是「大泰山」的概念，這一地域範圍，包括 10 個縣級以上政區（以當今行政區劃統計）。

泰山是以山系為基本依據的廣袤區域，主要可以分為四個區域：其一是泰山主峰區域，在泰安州城北部，最高處為玉皇頂；其二是位於泰山主峰西南側、泰城西側的蒿里山和社首山；其三是位於泰山主峰東南側的徂徠山，距離泰山主峰玉皇頂直線距離約三十公里。最後是位於泰山主峰南側的泰城區域及上述山脈未能覆蓋的附郭縣區域。位於泰山主峰西北側的靈岩山，由於其屬於濟南府長

12 宿基國等：〈泰山何其高 泰山何其大〉，《泰山研究》第十七、十八合輯（泰安：泰安市泰山文化協會、岱麓書院，2009 年），頁 77。

清縣的管轄範圍，且主要寺廟為著名的靈岩寺，則不列入本文「泰山」的統計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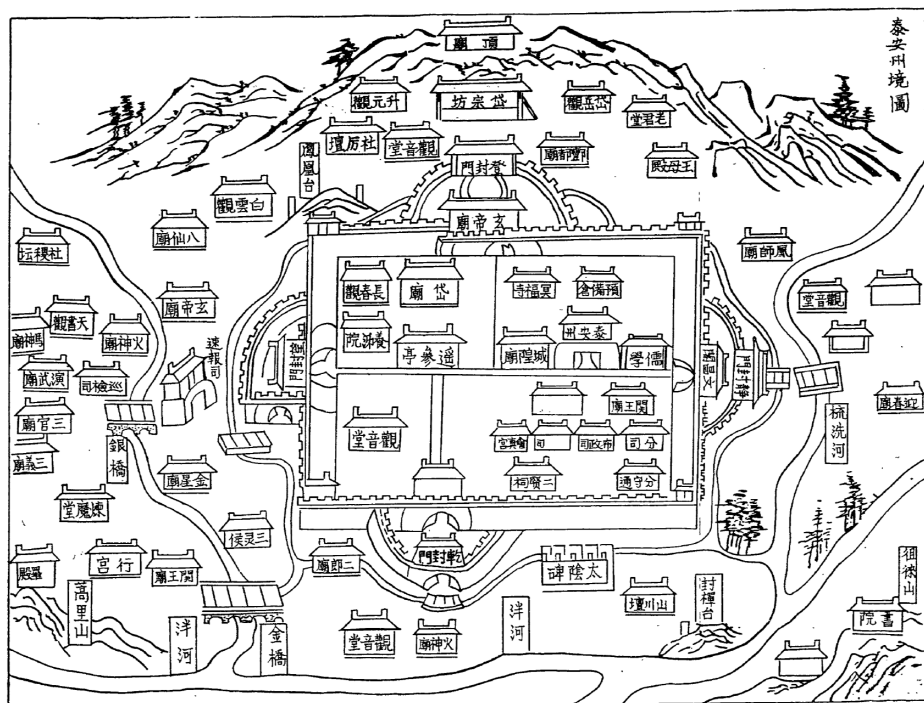


圖 2 明代泰安州境圖

泰山的管治屬於「嶽治」的範疇，而明代泰安州之管治屬於「州治」範疇，似乎討論「泰山道教」不應該涉及泰安州城及附郭縣。實際上「嶽治」與「州治」是密不可分的一個整體，理由有三：

其一，州治是泰山的管理主體，州城是泰山和地方管理機構的駐地。州城的形成過程體現著古時山嶽城鎮的規劃理念和營建方式。泰山所有道教寺觀的修繕、增置、道教人員的管理與委派、泰山香稅的收取與支配等等方面，都與州治管理機構有密切的關係。明代汪子卿《泰山志》對「嶽治」釋義如下：「嶽治何？州治之在嶽也。夫經以四嶽名官，史以泰山名郡，志嶽而必以治言，亦經史之遺意耳。」¹³

明代泰山道教的發展程度，與山東藩臬衙門及泰安州的各級

13 汪子卿撰，周郢校證：《泰山志校證》（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卷四，〈嶽治〉，頁603。

地方官吏對於宗教政策執行程度有非常大的關係。例如萬曆十四年（1586）岱頂建孔子廟；萬曆二十四年（1596）泰安州知州秦懋約以此廟「非禮」之故撤去，《小草齋文集》卷八：「亭旁故有文廟，秦守以非禮撤去。余謂：『廟去而存亭，可也。』」囑劉君葺之。」¹⁴後州守又恢復建置。

其二，泰山道教寺觀在歷代的逐漸演化過程中，一部分寺觀形成了上廟、中廟、下廟的建置格局，而明代的大多數道觀下廟都在泰安州城。因此，「言山不談城」必然會割裂泰山道教寺觀之間的聯繫。明代的泰山東嶽廟、元君廟都已形成上、中、下三廟格局。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泰安州禁約〉：「東嶽有上中下三廟，本州城北岱嶽廟係中廟，唐時武則天將岱嶽廟改作道觀。」¹⁵入明以後，碧霞元君信仰日漸興盛，儼然成為國家「正祀」，洪武以來，屢敕修岱頂碧霞祠。明內廷為祭祀方便，在泰山腳下建立奉祀元君的皇家專廟勢在必行。靈應宮之創，應肇源於此。明中葉後泰山元君三廟格局逐漸形成，上廟為岱頂碧霞祠，靈應宮成為元君下廟。此外，泰山還有很多寺觀也有上中下三廟建置。

其三，泰安州屬的道觀，道士流動十分頻繁。州城及其附縣居民出家為道士，為泰山道觀的人員構成提供了重要來源。泰山名氣顯赫的道觀時常成建制派出道士去住持一些周邊新開的道觀。明代泰安周邊的藩王如魯王、德王、周王在泰山修建的香火院，則延請周邊的知名道士前來住持。因此，泰山道教必然要與所屬泰安州城及附郭縣發生密切關聯。

由本文圖 1「明代泰山圖」（源自嘉靖《泰山志》卷首「泰山圖」，《岱史》改稱「泰山舊圖」），以及圖 2「明代泰安州境圖」（源自萬曆《泰安州志》卷首「泰安州境圖」）可以直觀體現泰山道廟的位置格局與道正司所在泰安州之間的關係。綜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對

14 謝肇淛：《小草齋文集》，卷八，收入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小草齋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73。

15 今碑佚，文存查志隆：《岱史》，卷九，〈靈宇紀〉，收入湯貴仁，劉慧主編：《泰山文獻集成》（濟南：泰山出版社，2005年），第二卷，頁98。

象「泰山道教教團」為泰安州道正司直轄範圍的道士。

三、明代泰山道教的歷史分期

明代泰山道教的歷史沿革，根據不同時段的官方政策和時局動態為政治風向，以道教宮觀的新建及重修數量為現實依據可分為整肅期、政策搖擺期、鼎盛期、衰落期四個階段，道教教團規模的興衰起伏與國家政策時勢密切相關。¹⁶

（一）整肅期（洪武至宣德年間）

整肅期歷經明洪武至宣德期間，經洪武、建文、永樂、洪熙、宣德五代皇帝，時長前後六、七十年。整肅期的宗教政策基本嚴格執行明太祖定下的祖訓，對宗教場所和宗教從業人員的規模和數量加以嚴格控制。

明朝立國之後，面對蒙元遺留的種種「弊俗」，明初在「復古」的旗幟下進行了大規模的禮俗改革。其禮俗改革涉及的範圍，大致可以歸納為兩類。一是遵照儒家政治理念，對元代因宗教政策「寬縱」而造成的各種失序現象進行嚴厲整飭，建立起符合傳統儒家文化的社會秩序；如洪武三年（1370）「神號改正詔」去除五嶽神號；¹⁷二是以「用夏變夷」的方式，對社會生活中瀰漫的「胡風」進行清整，以期恢復漢族的文化傳統。以上禮俗改革當然也包括宗教禮俗的內容。

洪武五年（1372）十二月明太祖認為原先宗教管理混亂鬆弛：「僧道之教，以清淨無為為本，往往齋薦之際，男女溷雜，飲酒食肉

16 匿名評審專家指出泰山道教不能簡單按道士人數的文獻記載進行分期，其理由如下：第一，某所道觀中的道士人數均為特定時段的記載，而非此一時段內所有道觀中所有道士數量所加之和；第二，道觀中道士的數量多為推測數據，且有些推測並未給出依據，單純為臆測。準此很難用這樣一個推測的數據來支撐不同歷史階段的分期。筆者對此表示認同，因此採用宗教政策的大規模變動來對泰山道教進行分期。特此感謝匿名評審專家的寶貴意見。

17 《明太祖實錄》，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六日條，頁 1033-1036。

自恣，已令有司嚴加禁約。」¹⁸於是詔令：「時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凡五萬七千二百餘人，皆給度牒以防偽濫。禮部言，前代度牒之給，皆計名鬻錢，以資國用，號免丁錢。詔罷之，著為令。」¹⁹洪武六年（1373）八月給度「九萬六千三百二十八人」。²⁰

到了洪武六年（1373）十二月，明太祖有感於「釋、老二教，近代崇尚太過，徒眾日盛，安坐而食，蠹財耗民，莫甚於此。」於是對寺廟道觀歸併縮減：「乃令府、州、縣，止存大寺觀一所，併其徒而處之，擇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²¹如果說洪武五年及六年發放度牒之舉著眼於「防偽濫」可以視為立國之初的懷柔政策，那麼洪武六年的新規則主要是對宗教從業人數無序增長的情況加以限制。

洪武二十四年（1391）六月，明太祖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重申了寺廟道觀歸併之制：

道教始於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汙教敗行，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眾者一所，併而居之。²²

至七月，明太祖再頒聖旨：

恁禮部出批，着落僧錄司差僧人將榜文去，清理天下僧寺。凡僧人不許與民間雜處，務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下者聽令歸併成寺。其原非寺額，剏立庵堂

18 同上注，卷七三，洪武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條，頁 1353。

19 同上注，卷七七，洪武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條，頁 1416。

20 同上注，卷八四，洪武六年八月十九日條，頁 1502。

21 同上注，卷八六，洪武六年十二月二日條，頁 1537。

22 同上注，卷二〇九，洪武二十四年六月二日條，頁 3109。

寺院名色並行革去。欽此。²³

明太祖按照「編戶齊民」方式，通過減少宗教場所數量加強對宗教從業人士的統一管理，地方對其身分核驗，若有問題，執送有司：

命禮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觀：凡歸併大寺，設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稅。每大觀道士編成班次，每班一年，高者率之。餘僧道俱不許奔走于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為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勿許。仍毋得翫菴堂。若游方問道，必自備道里費，毋索取于民，民亦毋得輒自侮慢。凡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以驗其實，不同者獲送有司。僧道有妻妾者，諸人許捶逐，相容隱者罪之。願還俗者，聽。²⁴

宣德二年禮部又重申此訓。²⁵

在明初整頓期間，明太祖詔令各府州應僅存大寺（觀）一所，不足二十人之寺觀應進行歸併。永樂十六年（1418）明成祖（1360–1424）之詔令州之僧、道定額不超過三十人。此間，泰山正規道士（有度牒）加上清修散居道士，數量應在百人以內。

（二）政策搖擺期（正統至正德年間）

政策搖擺期歷經正統至正德期間，經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七朝，時長前後八、九十年。政策搖擺期宗教政策的發布和執行並無準繩。景泰間首開鬻牒之例，成化間則濫發度牒，導致僧道度牒數量處於不可控的狀態。此期間除了弘治帝（1470–1505）力圖中興加強規範，其他皇帝在宗教政策方面都處於

23 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二，〈欽錄集〉，收入上海書店出版社編：《中國地方志集成·寺觀志專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第2冊，頁236。

24 《明太祖實錄》，卷二三一，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八日條，頁3372。

25 《明宣宗實錄》，卷三四，宣德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條，頁866–867。

搖擺不定的狀態，因此稱之為政策搖擺期。

結合《明實錄》記載可以推斷，很多主要道觀的道士在此期間已然成倍增加，例如會真宮、東嶽廟、遙參亭、碧霞祠、青帝觀、蒿里山、天書觀道士住錫數量之和已然超過百人，遠超泰安州原先三十人的定額。弘治帝曾敕令恢復原勅額，命令多餘道士遞歸原籍：

巡撫湖廣都御史梁璟言，比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請，查革武當山供給道士及額外進貢之擾民者。禮部移文，臣等覆議：近奉登極詔旨，停止一切額外貢獻。……又永樂中武當山食糧道士不過四百，近至八百餘人，道童亦有千餘，乞照額放免，以省冗食。……乞追回原勅額外者遞還原籍，庵觀拆毀，田土歸之舊主。從之。²⁶

但地方政府的實際執行力度並不徹底。

（三）鼎盛期（嘉靖至天啟初年）

泰山道教的鼎盛期始於嘉靖皇帝（1507–1567），他也是明代最為崇尚道教的皇帝。嘉靖十八年（1539）鬻牒成為規制，從此在制度上明朝政府徹底廢棄了明初對僧道人數嚴格的控制，由此解決了許多寺觀的傳承和運營問題。此期間歷經嘉靖、隆慶、萬曆、泰昌超過百年。許多的寺觀修繕、僧道入住都始於嘉靖朝。嘉靖二十三年（1544）立〈重修全真觀碑記〉：「傳至我朝，道業益興。」立於嘉靖二十六年（1547）前後的〈萊蕪縣王許村重修玉皇廟記〉：「皇朝承平日久，廟宇創者無算，廢者咸興。」²⁷ 嘉靖二十六年（1547）前，泰山元代名觀升元觀「惟頽垣廢址中，古樹蒼鬱，穹碑屹立……」²⁸，此年重修。

26 《明孝宗實錄》，卷二五，弘治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條，頁 571–572。

27 萊蕪市地方史志辦公室：《萊蕪金石志》（北京：線裝書局，2017年），頁 215。

28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大明國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升元觀重修大門之碑〉，頁 1287。

自嘉靖後，泰山寺觀得到大規模修繕增置，道士的居住條件、師徒傳承、香火供給等問題都能基本解決，泰山道教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階段。之後的萬曆皇帝（1563–1620）及慈聖皇太后（1545–1614）皆篤信佛教，而於道教亦崇尚有加。萬曆四十一年（1613），萬曆皇帝出內帑普修泰嶽：

修玉皇頂尊崇上帝，青帝宮、東嶽廟俱已改觀，修靈佑宮祇奉元君。浴聖殿、神憇宮，悉為更始。祝國皇經堂、五嶽會真堂，已砌起矣。又高大天門，所以聳瞻仰也。岱廟峻極殿、蒿里森羅殿，已增崇矣。²⁹

除了萬曆間會真宮毀於火災，長春觀後被禪僧所居外，明代道教鼎盛期新增道觀的數量遠多於廢頽道觀的數量。萬曆四十一年（1613），明神宗為其母慈聖皇太后眼疾祈福，在泰山大興建置：包括鑄造天仙金闕置於岱頂碧霞元君祠，鑄造銅鐘置於岱下靈應宮，並修繕了諸多泰山寺觀，使泰山道教場所面目一新。萬曆四十三年（1615）諸事功畢，在岱頂碧霞祠立〈敕建泰山天仙金闕碑記〉銅碑記其盛事。

明代皇家敕建的銅殿有二，其一為始建於明永樂十四年（1416）的武當山金殿（銅鑄鑲金），其二為萬曆四十三年（1615）所建泰山天仙金闕銅殿。天仙金闕由皇家出資，「中官董事，制倣武當」。³⁰但此時明朝已經由盛轉衰，內外形勢急劇變化：包括萬曆三大征特別是朝鮮之役，女真崛起並席捲遼東，持續的重大及特大旱災、疫災，始發於陝西並呈燎原之勢的民變，以及「三王並封」、「二王就藩」都需要國家財政應急支持。明廷國庫空虛，急需資金之處甚多。所以「應急財政」成為晚明財政的突出特點。³¹由此可知，萬

29 楊楷：〈敕修泰嶽大功告成賜靈佑宮金碑記〉，今立碧霞祠院西側。

30 蕭協中著，趙新儒校勘：《新刻泰山小史》（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頁70。

31 方興：〈礦稅銀兩、正額稅課與晚明財政〉，《歷史研究》2023年第3期，頁201–218。

曆晚期泰山天仙金闕的鑄造資金並不充裕。實地觀察可發現其構件表面有諸多沙眼及空損，與先前永樂朝同為敕造的武當山金殿質量有不小差距，反映了當時明朝國力已有衰頹之勢。

天啟五年（1625）泰山又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道教祭祀活動，諸多朝廷大員、府縣官員、地方檀越都參與了這次活動，事畢又立銅碑〈敕建泰山靈佑宮記〉。碑文所記多為追憶萬曆時期泰山道教盛舉，³² 記錄了泰山各廟觀此次大規模修繕，始於萬曆三十九年（1611）辛亥三月，迄萬曆四十三年（1615）六月落成，但延至天啟五年碑方得立。此可謂泰山道教鼎盛期最後的迴光返照。

（四）衰落期（天啟、崇禎時期）

在萬曆末期，山東已然旱災蝗災嚴重，萬曆四十三年（1615）山東春夏大旱千里如焚，以至於災民食屍。³³ 而泰山作為全國性的道教聖地，統治階層對其朝拜進香仍然不絕。而進一步導致泰山道教全面衰落的原因是隨之而來的大規模戰亂。

天啟五年（1625）明末農民起義大爆發，明朝與關外後金政權的對抗也屢戰屢敗，明朝政府陷入「苦虜苦寇」、兩面作戰的焦灼狀態。崇禎二年（1629）後金軍從喜峰口首次入塞，兵鋒直指北京，所過地區搶掠破壞嚴重。受此直接影響，來自山東以外地區（例如畿輔、齊魯、中州、江北）的香客急劇減少。崇禎十年（1637）陳弘緒（1597–1665）登泰山，後來《寒夜錄》有言：

予來已後期，不及見祈禳之盛。然詢之廟祝，云：崇禎己巳（二年，1629）以前，每歲香客多至八十萬，少亦六十萬，今不滿四十萬矣！畿輔、齊魯以迄中州、江北，

32 宗世強、朱學斌、張琨：〈泰山碧霞祠明代銅碑碑文校錄考證〉，《泰山學院學報》2022年第3期，頁16–24。

33 逢振鐸、江奔東：《山東經濟史·古代卷》（濟南：濟南出版社，1998年），頁495。

苦虜苦寇，半斃于鋒鏑，半竄于荊莽，何暇禱祀名山？³⁴

隨著時局不斷惡化，山東境內的大規模戰爭也愈演愈烈：例如崇禎四年（1631）吳橋兵變後引發的登萊之亂，山東臨邑、陵縣、商河、青城、登州等城橫遭蹂躪。後來清軍兩次繞開山海關毀邊牆而入河北直取山東腹地，先後攻陷濟南、武城、臨清、兗州等地，其中崇禎十一年（崇德三年，1638）多爾袞入關擄走人口五十餘萬、崇禎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阿巴泰入關擄走人口三十六萬九千多。同時天災也更趨嚴重，崇禎十一年至十四年山東連續四年大旱。³⁵崇禎十五年新泰上莊村保聚庵院所立〈重修保聚庵碑記〉中記：「數十年來，饑饉頻加，兵寇交集，吾新邑較他處尤慘。」³⁶這些戰亂都嚴重影響了泰山道教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導致道士數量也進一步急劇減少。

綜上所述，明代泰山道教在明初高壓宗教政策影響下，道士數量不足百人。正統至正德期間，道士人數雖略有增加，但由於寺觀增置很少，道士增加數量有限，且由於宗教政策搖擺不定，道士生存艱難。嘉靖至萬曆時期由於皇帝的極力推崇，泰山道教場所規模的發展達到明代的歷史高點。隨著天啟、崇禎天災戰禍的愈演愈烈，泰山道教的經濟基礎不斷被破壞，從而陷入了衰落。

四、明代泰山道教鼎盛期規模的研究方法

在對明代泰山道教劃分出不同歷史階段之後，由於材料的相對匱乏，無法窮盡其規模的發展全貌，需要選取文獻記載相對更為豐富的時期加以充分研究而不泛泛而談。不少傳世文獻記載當時泰山

34 陳宏緒（引者按：原名弘緒，因避諱，改稱宏緒，廣陵書社版《寒夜錄》作「宏緒」）：《寒夜錄》，卷中，收入曹溶輯，陶樾增訂：《學海類編》（揚州：廣陵書社，2007年），第8冊，頁4463。周郢：《泰山編年通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21年），頁847。

35 滕澤之著：《山東人口史》（濟南：山東省新聞出版局，1991年），頁154-155。

36 〈重修保聚庵碑記〉，現存於新泰市新甫街道上莊村保聚庵院。

的宗教活動，由此可大體窺見其規模，但也難以量化統計。例如萬曆三十八年（1610）學者楊爾曾編刊《新鐫海內奇觀》卷一〈岱宗圖說〉記泰山風情：「迴馬〔嶺〕而上，僧童多擊鼓彈箏于道，以邀遊人之賞。」³⁷ 萬曆四十四年（1616）詩人鍾惺（1574–1625）經天津至泰山，友吳惟明攜孫中途來偕。鍾惺友人譚元聲亦於前後登岱，其〈觀水簾前石經峪並紀山中所見聞者〉詩云：

所逢皆黃冠，閒僧安肯止。
 ……
 何人愛水石，寫經如藏寺。
 石丘不愧天，周身皆佈施。
 伸縮有妙裁，想見其指臂。
 自是願力切，非以佛為戲。³⁸

因為明代禮部僧道黃冊及地方僧道檔案未能存世，難以獲取泰山道教教團規模的準確數值。因此本文著眼於以附近地方史志與道廟金石文獻記載相結合的方式對明代泰山道教鼎盛期的規模進行推導，以道教的基本活動場所道廟為抓手進行研究。本文將基本的研究單位稱之為「道廟」是採用了王崗的觀點，因為明代道教場所有些是道觀，有些是神廟。在核實特定時段地段的道廟之後，通過實地考察散見的泰山金石的道士題名可以估判當時道廟從業者的數量，從而窺見明代泰山道教的發展過程，為全真道乃至道教在明代的沿革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現存最早的相關地方志是弘治元年（1488）泰安知州胡瑄修、御史李錦等纂的《泰安州志》十卷。但是，弘治《泰安州志》「祠廟」

37 楊爾曾：《新鐫海內奇觀》，卷一，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21冊，頁357。

38 廖元度選編，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校注：《楚風補校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下冊，頁884。

欄所載三溪神廟、顯靈王祠、謝元君廟、監池元君廟，³⁹ 以及「庵觀」欄所載傅老庵、黎胡庵等，到明代中後期已湮滅無聞，時間上也難以代表明代泰山道教的鼎盛期。而且目前現存泰山石刻材料及相關文獻仍未見對明代早期宮觀的道士有相應的記載，泰山道教團體規模的統計無法從明代早期開始。

明代泰山道教鼎盛期始於嘉靖年間，例如在宗教政策方面，明嘉靖十八年（1539），僧道鬻牒成為規制，明廷在僧道人數上不再控制，解決了許多寺觀的傳承問題。泰山許多的寺觀修繕、僧道入住都始於嘉靖朝。立於嘉靖二十三年（1544）的夏張鎮〈重修全真觀碑記〉有言：「傳至我朝，道業益興。」立於嘉靖二十六年（1547）前後的〈萊蕪縣王許村重修玉皇廟記〉即言：「皇朝承平日久，廟宇創者無算，廢者咸興。」⁴⁰

嘉靖三十四年（1555）刊行汪子卿所著《泰山志》是現存最早的泰山專門志書，第一次全面介紹了泰山的地理、風物、藝文等各方面的內容，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後世的泰山志書多深受汪志的影響。嘉靖《泰山志》之後又一部堪稱完備的大型泰山專志是萬曆十五年（1587）查志隆編著、鹽運司刊行的《岱史》十八卷。《岱史》是泰山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史料，後世有關泰山的著述也多徵引此書。例如〈香稅志〉記載了明代泰山香稅的設置和管理情況，是研究泰山經濟史的重要史料；又如〈山水表〉收錄了泰山自然實體、名勝古跡共二百餘處，對泰山道廟的分布和運營相關研究頗有價值。⁴¹

嘉靖朝基本奠定了泰山道廟的規模，萬曆朝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到頂峰。在弘治《泰安州志》之後的明代相關地方志僅有萬曆三十一年（1603）泰安知州任弘烈修《泰安州志》四卷，其中所列出的寺觀可謂為明代道教鼎盛期道廟的實錄。其「祠宇」欄列泰安

39 胡瑄修，李錦纂：弘治《泰安州志》，卷一，〈祠廟〉，明弘治元年（1488）刻本，頁十七上至十八上。

40 萊蕪市地方史志辦公室：《萊蕪金石志》，頁 215。

41 泰安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泰安歷史文化遺跡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1年），頁 216。

城寺觀有東嶽廟（遙參亭嘉靖後獨立）、會真宮（萬曆甲午毀）、青帝觀、后土殿、三皇廟、天書觀、長春觀（女道士廢絕，僧佔）、白雲觀、三官廟（西關、東關）、蒿里山森羅殿、靈派侯廟、淵濟公廟、關王廟、張仙祠、火神廟、龍王廟、真武廟、三陽庵、潛仙庵。除掉廢毀之會真宮及禪僧佔據的長春觀，州志記載道觀 18 處，考慮到遙參亭在明萬曆間已成為一處獨立道觀，故萬曆《泰安州志》實際載 19 處道觀。

但是，尚有大量道廟未列於萬曆《泰安州志·祠宇》欄，而出現於州志其他各處乃至其他方志。經綜合統計，在泰山主峰的道教寺觀如下：岱嶽觀、老君堂、風師廟、豐都廟、五道廟、關王廟（州城旁兩處、泰山高老橋一處）、升元觀、八仙廟、玄帝廟、馬神廟、演武廟、三義廟、大神廟、奎星廟、元君行宮、二郎廟、王母池、東嶽廟（岱頂）、玉皇頂、碧霞宮、二虎廟、龍王廟（竹林寺處）、周普庵、眼明殿、玉皇廟（回馬嶺）、青帝宮、孔子廟、後寢宮、靈官廟、白雲洞、龍王廟（十八盤處）。考慮到岱嶽觀與老君堂實為一觀（老君堂為岱嶽觀俗稱），所以明代泰山相關地方志可統計的道觀數量為 32 處。

本文選取《泰山志》、《泰安州志》、《岱史》作為嘉靖年間泰山道教規模研究的基礎文本。明代官方提供歲供祭祀銀的寺觀有東嶽廟、馬神廟、白龍池、蚩蠟廟，⁴² 其中的蚩蠟廟在州志「祠宇」及明代泰山圖未載，可補。已有相關材料證實為僧人住持的廟宇如金星廟、練魔堂等不再列入。但實際上，相關地方史志仍失載大量道觀。下面根據石刻材料及其他文獻記載，補充明代道教鼎盛期泰山的其他相關道廟：

① **龍泉觀**。「又曰斗母宮，在嶽之小龍口。嘉靖二十一年（1542）德府重建，濟南陳軫記石。」⁴³ ② **太平草庵**。嘉靖三十五年（1556）宮山道士劉玄詔攜徒於泰山中創建太平草庵（後世改為

42 任弘烈修，段廷選纂：萬曆《泰安州志》，卷三，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刻本，頁十上。

43 汪子卿撰，周郢校證：《泰山志校證》，卷二，〈靈宇〉，頁 242。

太平禪院)。詳見〈宮山太平庵摩崖題記〉。③元君廟。隆慶六年(1572)周藩胙城王府輔國將軍朱睦㮮於岱陰後石塢建元君廟，並立禁約碑以護廟產(立蔚然閣下)。⁴⁴④三元宮。舊址在萬仙樓西南側、盤道之西，為魯府香火院。萬曆二十九年(1601)魯府泰興王朱壽鏞(1639年卒，崇禎時進封魯王)於岱麓三元宮建一天亭。⁴⁵⑤隱仙觀。萬曆二年(1574)汶上道士于虻虛辟室於徂徠山礪石峪隱仙觀。⁴⁶⑥城隍廟。洪武五年(1372)泰安知州偃斯於州治西建城隍廟。嘉靖七年(1528)、萬曆十五年(1587)重修。⁴⁷⑦清虛觀。萬曆四十年(1612)泰安名宦蕭大亨(1532-1612)主持重修奈河西岸清虛觀。⁴⁸

前文論及本文的研究對象「泰山道教教團」為泰安州道正司直轄範圍的道士。因此泰安州道正司管轄範圍內附近其他道廟也應納入統計。萬曆《泰安州志》所記明代泰安州共有鎮店 75 個：「按鎮店廼鄉民群聚處也。」⁴⁹泰安州城外鎮店如夏張集、房村集、安駕莊集、道朗集、滿家莊集、孫伯集、舊縣集、東向集等在明代普遍有道觀，有的鎮店甚至有多個道觀，可列舉如下：

夏張集有①全真觀、⁵⁰②真武廟、⁵¹③關王廟，例如《岱史》「關王廟」欄記：「其一在高老橋。其一在城內營里街。其一在東關大石橋。其一在州西南下張集者尤靈異。」⁵²

44 孫星衍：《泰山石刻記》，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 26 冊，頁 15。

45 朱壽鏞：〈新建一天亭敘〉碑，《岱粹抄存續編》，卷二，收入王價藩、王亨豫輯錄，齊煥美點校：《岱粹抄存合編》(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8 年)，頁 84-85。

46 張琰：〈全真道呂祖蓬萊派及其祖庭考〉，《中國道教》2018 年第 4 期，頁 59-63。

47 李汝桂：〈重修城隍廟記〉，任弘烈修，段廷選纂，鄒文鬱續修，朱衣點續纂：康熙《泰安州志》，卷四，〈藝文〉，民國二十五年(1936)僅好書齋重刊本，頁七下至八下。

48 周郢：〈新發現的蕭大亨碑石敘錄〉，《泰山文化研究》2012 年第 4 期，頁 28-31。

49 任弘烈修，段廷選纂：萬曆《泰安州志》，卷二，萬曆三十一年(1603 年)刻本，頁十五上。

50 朱學斌、張冶：《明清泰山岱廟、全真觀、靈應宮道派傳承輯論》，《中國道教》2022 年第 2 期，頁 64-69。

51 周郢：《泰山編年通史》，頁 621。

52 查志隆：《岱史》，收入湯貴仁，劉慧主編：《泰山文獻集成》，第二卷，頁 112。

安駕莊集有④真武廟，〈重修真武祠碑記〉：

安駕莊坎方，舊有真武祠，創於正德之改元。積以伏臘，摧以風雨，周垣既頽，黃冠不留。……先是武氏辛卯建真武閣，甲辰建觀音閣，而是役又成。且施地若干以為香火之資，薦於神哉。⁵³

又有⑤顛仙祠始建於元末，泰山道士張志純（1220–1316）卒於會真宮中。鄉人於布山下建「邈邈張廟」（又稱顛仙祠），加以奉祀。清代汪寶樹撰〈泰安古跡考〉有記：「又張家埠村有邈邈張廟，村外有其父墓，前有宋代墓表，謂之龍公墓碑，志皆缺而不錄，亦憾事也。」⁵⁴

道朗集有⑥關帝廟，在今道朗鎮魚池古村現遺留明清至民國時期的碑刻十三通。據〈重修關王廟碑記〉碑記載，「大明成化丁未（1487）素商垂脫之秋長庚伴月之日」對關王廟進行了一次重修，另外根據正德二年（1507）〈重修關王廟碑〉和萬曆十五年（1587）〈重修關公廟碑〉記載可知，關帝廟後來在明代經過了多次重修。

東向集有⑦玄帝閣、⁵⁵ ⑧通道宮，其中通道宮在今肥城邊院鎮東向村，明代屬泰安州東向集，此宮建成於元至元十七年（1280）。由〈重修全真觀碑記〉題名「通道宮住持陳崇齡，唐崇仙；徒康真瀛、劉真和」可知嘉靖二十三年（1544）通道宮仍存。⁵⁶

滿家莊集有⑨龍王廟，可參見乾隆七年（1742）所立〈龍王廟重修石橋記〉對於明代修廟的追憶：「大清國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城南四十五里迎駕莊地方上泉莊，古有龍王廟一座。查廟修建之由來，

53 萬曆三十五年（1607）後，宋燾（1572–1614）罷官回里，故此記立於萬曆三十五年後。宋燾：〈重修真武祠碑記〉，《岱粹抄存》，卷一，收入王價藩、王亨豫輯錄，齊煥美點校：《岱粹抄存合編》，頁7。

54 汪寶樹：〈泰安古跡考〉，《岱粹抄存》，卷二，收入王價藩、王亨豫輯錄，齊煥美點校：《岱粹抄存合編》，頁52。

55 〈萬曆三十八年重修玄帝閣記碑〉，趙衛東等：《山東道教碑刻集·肥城卷》（濟南：齊魯書社，2020年），頁214。

56 周郢：〈新發現的徂徠山煉神庵摩崖考〉，《中國道教》2012年第3期，頁33–39。

自明時建修。」⁵⁷

房村集有⑩靈陽宮，位於岱岳區房村鎮北滕村東北方向七百米處。民國《重修泰安縣志》卷二〈輿地志·建置〉載：「靈陽宮，在大汶口南滕村，距城六十三里，久廢，有元代至元二年碑。」〈重修全真觀碑記〉有題名「靈陽宮道士呂崇泰」。靈陽宮在萬曆年間應存。⁵⁸ 另外，舊縣集有⑪三官廟，⁵⁹ 角峪莊有⑫玉皇殿，⁶⁰ 孫伯集有⑬岱陽觀。⁶¹

綜上統計，明代萬曆間泰安州城外鎮店尚有 13 處道廟，加上地方志未載的 7 個道廟，明代泰山道教在鼎盛期共有 72 個道廟可以被紙上文獻及實地考察的金石材料證實。

本文研究的主要方向為明代泰山道教鼎盛期的道士規模，故按文獻記載的多寡及石刻材料的留存情況，將泰山道廟分為可量化規模的道廟及其他目前難以量化規模的道廟。兩者的區別在於前者的文獻記載或石刻留存內容足以量化統計與推測其規模。明代泰山道廟有延有革，或修或廢，從明初到萬曆間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因此有必要對其歷史沿革進行延伸考證。

五、可量化規模的明代泰山道廟

明代泰山不少道廟在紙上文獻和金石材料都留存了大量材料，例如按歷代賜額情況及興建時間可判斷是歷史道廟還是新建道廟，不同類別材料的綜合為研究明代泰山道教鼎盛期道廟的規模的歷史沿革提供了相對直接的依據：

57 袁明英主編：《泰山石刻》（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六卷，頁1922。

58 嘉靖二十三年（1544）〈重修全真觀碑記〉原碑仍存泰山岱岳區夏張鎮朱家莊全真觀。

59 三官廟有正德和崇禎間重修碑。袁明英主編：《泰山石刻》，第十卷，頁3032。

60 現存明正德等多塊殘碑。袁明英主編：《泰山石刻》，第十卷，頁3001。

61 〈明萬曆三十四年重修天仙聖母行宮記碑〉，趙衛東等：《山東道教碑刻集·肥城卷》，頁2。

（一）岱廟（岱下東嶽廟）

明代泰安州初設道正司於會真宮，後移於岱廟（東嶽廟）。嘉靖三十四年（1555）刊汪子卿撰《泰山志》：「僧正司在冥福寺，道正司在岱廟。」⁶²汪子卿編撰《泰山志》始於嘉靖二十三年（1544），付梓前山東按察司僉事曹金又續補嘉靖二十三年至三十三年（1554）十年間官吏告祭及新撰泰山詩文等內容，可知在嘉靖二十三年前，道正司已從會真宮遷至岱廟。

通過綜合考察泰山東嶽廟碑刻及《明實錄》，宣德十年（1435）前明廷曾七次遣道士往東嶽廟致祭，但致祭所遣道士皆非泰山東嶽廟道士。⁶³東嶽廟是否有道士住錫及規模如何，趙衛東通過兩處史料證實明代東嶽廟有道士常住，但未明道士入住起始時間。⁶⁴《明實錄》正統元年（1436）有載：

湖廣布政司照磨所檢校程富奏：「衡州府衡山縣古有南嶽廟，年久滋敝，有失觀瞻，請設道士及佃戶修整。」事下行在禮部覆奏：「因言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事同一體，俱合用道士，或十名，或五名，每廟廟戶四名，灑掃供役。仍令該管府、州、縣官時加巡視，以稱崇祀之禮。」從之。⁶⁵

這段覆議說明了幾個明初的道教治理政策問題：一是說明前往五嶽、五鎮、四海、四瀆致祭的道士數量、廟戶之配置朝廷已有定制，此定制至少在宣德年間已有；二是在明太祖寺觀歸併之詔令及明成祖寺觀僧道定額之詔令下，除少數道觀如龍虎山、武當山等尚為朝廷關注外，其他道觀荒廢極多，即使是五嶽、五鎮、四海、四

62 汪子卿：《泰山志》，收入湯貴仁，劉慧主編：《泰山文獻集成》，第一卷，頁213。

63 《明英宗實錄》，卷四，宣德十年四月二十六日條：「宜遣大臣於在京廟觀祈禱，仍分遣道士詣天下嶽、鎮、海、瀆用祈，豐稔無稽無忽」，頁95。

64 趙衛東：〈明清時期的泰山東嶽廟道士〉，「東嶽信仰與北京東嶽廟」學術研討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13年5月7日）。

65 《明英宗實錄》，卷十六，正統元年四月二十一日條，頁316。

瀆範圍的道觀也難逃「滋敝」之運；三是地方官員對朝廷宗教政策難以把握，只得逐級請示；四是說明至少在弘治間五嶽致祭還是由朝廷派遣道士，例如根據弘治十三年（1500）《明故奉政大夫湖廣岳州府同知胡公墓誌銘》可知至少在弘治間，東嶽廟祭祀道士仍由朝廷委派：「州有神號玉女者，民崇信備至。至鑄三銅像以事。公曰：神而有靈，一已足矣。命毀其二為夫子廟祭器。朝廷每遣中貴人禱祀于山神，貲動以千鎰。公預為備，民賴以安」。⁶⁶ 因此可推斷正統前東嶽廟是沒有道士住持的。⁶⁷ 明代東嶽廟最早出現道士的記載始於成化七年（1471）所立〈東嶽廟供器碑〉：

案照先據山東按察司分巡濟南道僉事張口呈為民情事，照得近蒙朝廷節次差官，前往泰安州東嶽廟修建齋醮及祈禱等事。其一應供用器皿，俱是該州里長出錢雇賃送用，中間多是褻器，不堪供用，及至破損，又要賠償，十分負累。呈乞定奪等因，已付本官，督同該州官吏拘集本廟住持及各色鋪行計議，合用物件，估計價值支給香錢銀布等物，共折算優銀柒百柒拾壹兩伍錢肆分。差委縣丞梁驥率領泰安州老人侯祿等，前去南京、浙江收買及蓋造庫房收貯去後。⁶⁸

從碑文知成化間東嶽廟有住持一職，亦當有道士。

據趙衛東、秦國帥等學者的研究，岱下東嶽廟道士的宗派屬於全真道龍門華山派，其字輩譜為：「通玄全真沖和德，正本恆成位尚仙；仁能貞心傳義紀，世見生前浩太元。」⁶⁹ 傳世文獻有時亦記載

66 《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第24冊，頁45。

67 《明會典》亦記載：「正統八年，敕……凡修完應祀壇廟，皆選誠實之人看守，所司時加提督。」申時行等：《明會典》（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一八七，〈廟宇〉，頁945。

68 東嶽廟供器碑，今存岱廟東碑廊。泰安市文物局編：《泰山石刻大全（增訂本）》（濟南：齊魯書社，2018年），第6冊，頁44。

69 秦國帥：〈明清以來（1368-1949）泰山道派考略〉，《中國道教》2011年第3期，頁30-36。

岱廟道官，例如萬曆四十八年（1620）道官仝沖玉。⁷⁰ 萬曆二十七年（1599）四月，泰山東嶽廟得到明神宗所賜《道藏》一部。⁷¹ 根據清代東嶽廟規模，⁷² 可推測明代鼎盛期萬曆以前東嶽廟道士應有四、五十人，崇禎末則迅速減少。

（二）岱陽三陽觀

三陽觀坐落於泰山南麓的凌漢峰，系嘉靖三十年（1551）東平道士王陽輝（號三陽）率其徒咎復明（號雲山）創建。德藩承奉于志清與開封士人張樂峰築室岱陽凌漢峰下，此為三陽庵創構之始。隆慶四年（1570）蕭大亨撰〈建立三陽庵記〉：

庵以三陽名者，從全真道士王三陽之號也。嘉靖辛亥，三陽率其徒雲山咎復明霞游岱嶽，卜地修真。……龍泉于公復謀於時庵陳公、南泉裴公，各捐金若干，增置殿閣，繚以石垣，益加勝概。即而事聞德王殿下，以為香火院，命典服松岡馬公市莊宅一區，地三十畝，以為焚修道眾衣糧之資。⁷³

由於應萬曆皇帝、鄭貴妃之請，三陽觀在住持咎復明帶領下進行了

70 萬曆四十八年（1620）正月，泰安接連發生東嶽廟青龍神像「吐火自焚」及嚴重風霾等災異。據分守濟南道右參政程啟南呈據泰安州申稱：「正月初九日起更時分，據岱廟道官仝沖玉口報：有本廟配天門東青龍神一尊，身高二丈有餘，口內出火，甚為怪異。」王在晉：〈青龍神吐火疏〉，《三朝遼事實錄》，卷二，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437冊，頁75-77；孫之騷：《二申野錄》，卷六，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編委會，四川大學圖書館編：《中國野史集成續編》（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第14冊，頁743；查志隆：《岱史》，卷十八，收入國家圖書館分館編，石光明、董光和、楊光輝主編：《中華山水志叢刊·山志卷2》（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頁336。

71 事見泰山碧霞祠西「天柱」石刻下方摩崖太監李升題名石刻。

72 〈禹貞文感恩復贍田碑〉紀念岱廟香火地復歸，題名有仁字輩5人，能字輩11人，貞字輩14人，心字輩9人，加上道紀禹貞文合計40人。泰安市文物局編：《泰山石刻大全（增訂本）》，第6冊，頁133。關於此碑文的記載蒙泰山學院孫家峰提示。

73 王價藩、王亨豫編，齊煥美點校：《岱粹抄存合編》，頁33。

幾次建醮活動，聲望達到高潮，弟子常住有五十人以上。

目前三陽觀西南道士林現存墓碑十餘塊，其中有明代道士墓碑多塊，往往有列舉道士師徒傳承，是以墓碑題名可作為研究的佐證。關於三陽觀宗派歸屬，據考證為全真派別果老祖師雲陽派，⁷⁴ 王三陽為該派第四代傳人。嘉靖三十四年（1555）王陽輝墓碑有徒弟、徒孫、學徒共 26 人；萬曆二十七年（1599）答復明墓碑題名中可明確歸於三陽觀的道士 61 人；萬曆三十七年（1609）黃堅廉墓碑有道士題名 36 人；天啟四年（1624）張守香墓碑有道士 36 人；崇禎三年（1630）史守知墓碑有道士題名 34 人。由此可綜合推斷明代道教鼎盛期三陽觀的道士數量在三十至六十之間。

（三）岱下靈應宮

此處靈應宮專指岱下靈應宮。泰城自古相沿有「元君三廟」之說，即上廟岱頂碧霞祠，中廟紅門宮，下廟靈應宮。泰安天書觀鐵塔，現位於岱廟後花園，明嘉靖十二年（1533）八月造。原置於泰安城西門外汶陽橋北的天書觀內，有十三級塔身，現僅存三級。1973 年移入岱廟保存至今。在其東北面第三層有銘文：

山東布政濟南府泰安州泰山靈應宮焚修住持：李泰輝、劉崇瑾、李順□、王教臣、趙泰□；道士：王希名、吳泰松、馬順福、張希□、臧希貴、王崇現、王景表、米景孜、劉尚德、鄒尚禮、應真相、張尚宗、劉崇□、高順岱、時道寧、張通英、丁教仁；碧霞靈應宮住持：吳玄義；道童：劉景祿、高教真、韓尚名、李崇德。⁷⁵

泰安天保鎮（今新泰天寶）嘉靖丙午年（1546）〈重修廣生神

74 趙衛東：〈泰山三陽觀及其與明萬曆宮廷之關係〉，《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三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年），頁 280-306。

75 釋文內容為作者對鐵塔銘文的錄寫。宗世強、張治、張佳美、高凌雲：〈天書觀明代鐵塔捐修題名稀姓研究〉，《泰山學院學報》2021 年第 1 期，頁 38-42。

祠創建牛王山地廟記〉碑後署「前泰山靈應宮羽士敬庵子封尚欽題額」。⁷⁶ 至於上述所記靈應宮是指岱下靈應宮還是岱頂碧霞祠，需要再加考釋：成化五年（1469）大觀峰梁驥題名有：「重修昭真觀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殿宇銅脊鐵瓦，大明成化伍年七月望日，董工縣丞梁驥識。」⁷⁷ 明憲宗賜額昭真觀為「碧霞靈應宮」（即今碧霞祠）。⁷⁸ 從靈應宮之沿革來看，岱下靈應宮與岱頂靈應宮有時在稱謂上容易混淆。但從天書觀與岱下靈應宮的距離，以及碧霞靈應宮住持吳玄義又曾任過天書觀住持來看，上述題名中之「靈應宮」更傾向於岱下靈應宮。

從隆慶三年（1569）王母池鐵鐘銘文及天啟五年（1625）岱頂靈佑宮〈敕建泰山靈佑宮記〉碑陰題名來看，岱頂碧霞祠道士一般稱「寢宮道士」及「頂廟道士」，罕見稱其為「靈應宮道士」或「碧霞祠道士」。岱下靈應宮在嘉靖十二年（1533）有道士 27 人，到萬曆、天啟間應有所增加。

（四）王母池

道觀王母池，唐以前稱群玉庵，原為岱嶽觀一隅。唐高宗時，分岱嶽觀為二，其東之王母殿仍祀西王母。王母池現存有隆慶三年（1569）鐵鐘，其上銘文字跡清晰。在鐵鐘第二層大字「雨」、「順」之下題名共計 12 人，基本反映了王母池在嘉靖後的道教從業者的規模：

菅崇安、劉師父、鄭師父、王崇太，志云：造鐘把總
丁文照，男丁衡；寫人柴彥齡；庵主（萊）〔蔡〕崇爐，

76 周郢：〈歷史檔案中的泰山靈應宮〉，《全真道研究》第八輯（濟南：齊魯書社，2019年），頁 28-37。

77 梁驥題名即重修昭真觀題記，在 2006 年 6 月發現。按昭真觀，即岱頂碧霞祠之古名。章丘縣縣丞梁驥時領泰山各廟差役事務。因此役所立劉定之記碑早已佚失，故新發現的梁驥重修題名，實為現存最早的碧霞祠重修刻石。感謝趙波平老師提供相關信息。

78 胡瑄修，李錦纂：弘治《泰安州志》，卷一，〈祠廟〉，明弘治元年（1488年）刻本，頁十九上。

徒子崔教清，徒孫韓演□，聲明四方。善人施捨資財造大鐘，一（科）〔刻〕萬（宰）〔載〕久遠。王母池看香道姑陳（常）〔崇〕壽募化十方貴宰，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城北，大明國隆慶三年歲次月喜，募化弟子陳（常）〔崇〕壽、徐教福、袁教□、張教□，徒侄王教春。⁷⁹

《泰山紀事》記載了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前，尼魏氏焚修王母祠時，盜伐白鶴宮（老君堂附近）古樹，十去其七八。⁸⁰ 此處「尼」當為道姑，「魏氏」應時任王母池住持。從女冠字輩來看，有「崇」、「教」、「演」，字輩雖不完整，但可大致判斷王母池女冠宗派為全真道華山派。在清代康熙間王母池道士發生了轉宗，變為龍門派。王母池明代為道姑住持，清代轉為道士住持。

（五）泰山後石塢（娘娘廟 / 元君廟 / 姑子廟）

泰山後石塢元君廟位於玉皇頂北、堯觀頂東，北依天空山，東靠九龍崗，南臨亂石溝，依山勢而建，為岱陰古建築群，稱「娘娘廟」或「元君廟」，俗稱「姑子廟」。相傳碧霞元君成仙前就是在此修煉的，所以這裡又稱「玉女修真處」。東院還有一處山洞名為黃花洞，亦稱黃華洞，因至秋季洞周圍多黃花（菊花）而得名，傳為元君修真處。

紀年已殘之〈後石塢禁約碑〉，可推斷立於萬曆初年：

除已往不究（引者按：缺）山柴，四至界分，東至□棚，南至潤南崖，西至跌（引者按：缺），道姑王崇泰等照舊斫割，以為焚修之資。敢有□□害者，許道姑報知泰山巡邏官並民壯，地方人□□□□□□□□憑問究，禁治

79 經現場勘查鐵鐘現在仍在王母池入口左手邊，有圍欄。

80 宋燾：《泰山紀事·地集·老君堂》，收入湯貴仁、劉慧主編：《泰山文獻集成》，第二卷，頁340。

不怨，口至告示者。⁸¹

此處「道姑王崇泰」即王母池鐵鐘題名的「王崇太」，可知後石塢之道場乃是王母池之別院，道姑為王母池所遣。

萬曆二十年（1592）後石塢黃花洞聖母寢樓題刻有：

蒙山東布政使參政代管運司甘老爺、運同徐老爺委，曆城縣人趙廷佐、張來儀、王宗智、劉璫、肖虎、劉彥奎等，修天空山黃華洞聖母寢宮樓一座。庵主單道姑、單教雨姊妹二人。山東提學道副使李老爺施銀。福建道御史陳老爺施銀三兩。萬曆十九年起，二十年工完立。⁸²

後石塢元君廟女冠住持其中的時間，始於隆慶六年（1572）之後。其歷任主事者有王崇泰（〈後石塢禁約碑〉）、單教雲、單教雨（〈修天空山黃花洞聖母寢宮樓〉）、孫衍玉（〈後石塢禁約碑〉）、吳真元（〈後石塢禁約碑〉）等。後石塢為王母池別院，其道姑宗派應與王母池都屬於全真道華山派。從後石塢元君廟石刻所記女冠出現的「崇、教、演（衍）、真」字輩，與此論相合。後石塢當有道姑 6 至 8 人。

（六）泰山頂上各廟

明代石刻常見泰山「頂上各廟」題法。嘉靖四十三年（1564）居堯題名中有：「頂廟委官任長清縣縣丞收嘉靖四十三年夏季香稅，居堯刻石。」萬曆二十一年（1593）省祭官題名中有：「□□道□長清縣省祭官□□頂廟各處□□至九月□□□勒于石。」⁸³天啟五年（1625）岱頂靈佑宮所立〈敕建泰山靈佑宮記〉題名有「頂上各廟」一欄。按岱頂廟宇分布來看，「頂上各廟」應包括孔子廟、青帝宮、

81 〈後石塢禁約碑〉，今立後石塢廟院。

82 〈修天空山黃花洞聖母寢宮樓碑〉，今嵌後石塢蔚然閣壁。

83 以上兩處題銘感謝泰山學院孫家鋒提供錄文相關信息。

岱頂玉皇廟、碧霞元君祠及後寢宮、岱頂東嶽廟。

①**碧霞元君祠**。天順五年（1461），山東按察使王越（1426–1499）與巡按康驥（1424–？）及前翰林學士許彬（1393–1468）同登泰山，王越〈登泰山記〉描述：「近門（引者按：南天門）有三清廟，廟東三里，天仙玉女祠，祠瓦皆用鐵，否則為風所挾去。祠之右，土房三四楹，數道士居焉。」⁸⁴ 可知天順間碧霞祠已有道士住持。

嘉靖二十九年（1550）南京吏部主事楊繼盛（1516–1555）考滿入京，道由山東，登泰山絕頂。楊繼盛《自書年譜》卷自述泰山之遊：「遂登至頂，有道士三十余人，奏仙樂，提香炉，迎接至玉女祠，乃設拜簏於中，欲贊礼使予拜，予遂叱散。」⁸⁵ 可知嘉靖中期頂上各廟道士至少在 30 人以上。

②**孔子廟**。萬曆十四年（1586）前，濟南推官郝大猷（1550–1609）在岱頂創建孔子廟，未完工而遷官。十月，山東鹽司同知查志隆上書撫按，議請續加構建。上官從其請，於岱頂建孔子廟，並奉祀如議。建構規劃中提出「仍於殿之兩偏，構道房居黃冠，以供掃除云」，「仍於殿旁構造房三間，責令本山道士兩名常住看守」。⁸⁶ 可知孔子廟自明代就由道士負責整理清掃，道士則由頂上各廟指派。

③**岱頂東嶽廟**。明清時泰山東嶽廟共有兩座：一建於岱頂，一建於岱下。成化四年（1468）山東巡撫原傑（1417–1477）以岱頂昭真祠（今碧霞祠）年久墮墜，發起重修，此役並重修南天門、三靈侯殿、岱頂東嶽廟等。可知在成化前，岱頂東嶽廟就有建置。另外，天啟五年（1625）岱頂靈佑宮〈敕建泰山靈佑宮記〉碑陽有道正司趙正全題名。

嘉靖四十四年（1565）十二月，歐大任（1516–1595）遊泰山後認為東嶽神祠規模不如其南的碧霞元君宮，是謂「香火不如

84 王越：〈登泰山記〉，收入趙長海校注：《王越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 72。

85 楊繼盛：《自書年譜》卷，現藏河北省文物保護中心；高朝英、張金棟：〈楊繼盛《自書年譜》卷考略（上）〉，《文物春秋》2011 年第 2 期，頁 61–72。

86 查志隆：《岱史》，卷十，〈靈宇紀〉，收入湯貴仁、劉慧主編：《泰山文獻集成》，第二卷，頁 113、115。

玉女」。⁸⁷ 萬曆以後，二者規模的反差更為明顯：萬曆二十一年（1593），鄭汝璧（1546–1607）所見已是「岳祠露而荒落，不勝香火」。⁸⁸ 萬曆四十五年（1617），王思任（1574–1646）〈觀泰山記〉描繪元君廟「金壁輪奐，靈爽赫然」，而東嶽廟則已頹圮，甚至「反有遺洩者」。⁸⁹ 崇禎十年（1637），畢自嚴（1569–1638）至岱頂東嶽廟所見「滿目傾頹，鐵瓦數百飄積毀垣敗壁間」。⁹⁰

頂上各廟的道士管理體系目前還不完全確定，可推測岱頂東嶽廟應與岱下岱廟為一系，其道派體系亦應一致。而碧霞元君祠在管理上可能與岱廟一體，但住持道士未必為同一派別。頂上各廟之間還互有往來與配合。從明代頂上各廟的修繕工程承辦者來看，其工程都屬於欽工範圍。

金石材料中關於頂上各廟的道士之記，首先有隆慶三年（1569）王母池鐵鐘的銘文（在大字「風」、「調」之下）：「玉皇頂住持高全才，……寢宮住持趙元蓬，……頂廟住持楊真信（引者按：因無法判斷後繼者是否為道士，不錄）。」其中玉皇頂即指岱頂玉皇廟，後寢宮當歸屬碧霞元君祠，頂廟當指碧霞元君祠。青帝宮，宋時舊構，明時多次刊石，明末清初廢頹，⁹¹ 後重修。另外，天啟五年（1625）岱頂靈佑宮（碧霞祠）〈敕建泰山靈佑宮記〉碑陰有題名：

87 歐大任：《歐虞部文集》，卷八，〈游泰山記〉，頁十二上，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部，第47冊，頁138。

88 鄭汝璧：《由庚堂集》，卷三八，〈睹記〉，頁二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357冊，頁97。

89 王思任著，任遠點校：《王季重十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57。

90 畢自嚴：《石隱園藏稿》，卷三，〈三叟同游記〉，收入永瑤、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集部，第1293冊，頁446。

91 順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詩人方文（1612–1669）行泰山之遊作〈嶽廟歌〉有：「昨者予上泰山頂，聖母之祠甚華整。青帝宮為野火焚，東嶽廟中香燭冷。」方文：《蠡山續集·魯遊草》，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8冊，頁534。可知清初青帝宮仍處於荒廢狀態。

寢宮道人：盧高元、韓和玉、張高明、陳高林、王高大、張高齊；

頂上各廟：宋沖湖、位真旻、史應真、索全峰、趙真太、李真福、周沖學。⁹²

從青帝宮共有東、西配房六間來看，⁹³ 道士數量不會太多，應在 10 人以下。結合頂上各廟的具體情況，可判斷其宗派有歸屬龍門派、龍門華山派及其他全真岔派，其道士數量應在 30 人以上。

（七）泰安全真觀

泰安夏張鎮朱家莊在泰安城西南五十里，古稱上章村，全真觀在金泰和年間（1201–1208）已有建置。王道悅住持奉高修真觀，門徒眾多，其徒巨陽子韓志具於泰安西南上章村建全真觀（今岱岳區夏張鎮朱家莊），後其徒張志起嗣主觀事，得州將李貴等資助，大起殿堂，祀以三清，殿宇宏麗甲於東州。元中統二年（1261）十月宋子貞（1186–1266）撰〈全真觀記〉：「其觀在岱宗西南五十里，曰上章村。金明昌間，道者巨陽子始築室其上，學為全真。」⁹⁴ 刻於嘉靖二十三年（1544）的《重修全真觀碑記》碑末有眾多道士題名，其中全真觀道士有 17 人：

嘉靖二十三年歲次甲辰秋九月十三日本觀住持李崇慶等立石。道正司道正：趙崇利、李尚信。蒿里山住持：李景淵；徒：楊教元、李教達、徐教貞。通道宮住持：陳崇齡，唐崇仙；徒：康真瀛、劉真和。靈應宮住持：米景孜銀伍錢，郭景祥。本觀道眾：鄭崇嶽、趙崇敬、李崇

92 釋文錄自宗世強、朱學斌、張琨：〈泰山碧霞祠明代銅碑碑文校錄考證〉，頁 16–24。

93 〈泰山山頂附中天門工程計劃書〉，《山東省建設月刊》1933 年第 3 卷第 12 期，頁 17。

94 宋子貞：〈全真觀記〉，收入王宗昱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3。

德、羅崇雲、呂崇義、王崇玉；徒：張教訖、王教談、徐教認、張教良、魯教詔、徐教□、馬教誦、李教□、徐教還、李教論；徒孫：李演相。靈陽宮道士：呂崇泰。玉皇廟女冠：崇善、張太、張領。泰山行宮道人：王演通；道友：李崇賢，羅宗勉。⁹⁵

由於此碑中道士皆為泰安州道正司所轄，故可將通道宮、靈陽宮、玉皇廟、泰山行宮道士合併進來，共有 26 人。蒿里山、靈應宮另有專論，不計在內。

（八）泰山三義廟

靜虛道人王一山修道於泰山凌漢峰下。一山，字秀峰，號靜虛，工於醫術，多奇驗，四方就醫者無算，先結廬於南墅，後徙茲山。道士王一山名又見泰城東郊漸汶河村萬曆十五年（1587）劉霽〈三義廟記〉碑：「三義廟舊址，原殿前數步許，創建於我曾祖理，重修於道士王一山，迄今百餘秋矣。」⁹⁶ 嘉靖四十二年（1563）侯貴撰〈靜虛道人墓表〉，今存三陽觀道士林。碑末題：「孝徒張禮朴、韋陽安；徒孫劉來緒、韋思忠。」⁹⁷ 所以據此推斷萬曆初年泰山三義廟道士規模在四、五人左右。

六、其他明代泰山道廟的規模

上節未涉及的其他明代泰山道廟可能亦曾經是規模較大、歷史較早、香火很旺的道廟，但由於文獻殘佚而僅存道廟名目，所以很難估算其道團規模。其中有部分道廟在文獻偶有隻言片語，殘刻或留道士題名，但也已難以完整刻畫道廟的道教活動情況及統計出道

95 〈重修全真觀碑記〉原碑仍存泰山岱岳區夏張鎮朱家莊全真觀。

96 劉霽：〈三義廟記〉，《泰安劉氏族譜》，卷一，民國甲寅（1914）永睦堂刊本；轉引自周郢：〈《三國演義》與泰山〉，《泰山學院學報》2021年第1期，頁63。

97 《岱粹抄存續編》，卷五，收入王價藩、王亨豫輯錄，齊煥美點校：《岱粹抄存合編》，頁165。

士數量：

（一）會真宮

泰山會真宮原為奉高宮，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968–1022）封禪泰山後，下詔改駐蹕的奉高宮為會真宮：「增葺室宇，務從嚴潔，無事雕飾，自京選名德道士住持焚修。」⁹⁸ 弘治《泰安州志》卷一〈祠廟〉：「會真宮：在州治南百步，即古奉高宮，宋真宗祥符中改今名。成化十八年（1482）重修玉皇殿。」⁹⁹ 洪武十五年（1382）明廷設僧道二司，並對僧道從業資格及人數嚴加限制：「置僧道二司在京，曰僧錄司、道錄司，掌天下僧道；在外府州縣設僧綱、道紀等司，分掌其事。俱選精通經典戒行端潔者為之。」¹⁰⁰ 泰安州設道正司於會真宮，設僧正司於冥福寺，分別管理道、佛事務。¹⁰¹ 從道正司設於會真宮可確認其中有道士住錫，《明實錄》正統十年（1445）九月載：「山東濟南府泰安州道正司奏，東嶽泰山上有昭真等宮觀，俱係歷代古跡、神祠，年久損壞，乞賜修葺。從之。」¹⁰²

按照洪武間的幾次詔令，泰安道正司所在地會真宮顯然屬於「大寺」叢林，其他人數不滿二十人的零散小道觀道士，都需要集中到會真宮及其他大觀。

永樂十六年（1418），明成祖對州府寺廟道觀住持人數做了具體規定：「上以天下僧道多不通經典而私簪剃，敗辱教門，命禮部定通制：今後願為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仍命禮部榜諭天下。」¹⁰³ 若嚴格執行明成祖對僧道嚴格限制的政策，泰安州道士總和不應超過 30 人。而皇帝御定之道場

98 趙恆：〈改奉高宮曰會真宮詔〉，收入《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一一七，頁397。

99 胡瑄修，李錦纂：弘治《泰安州志》，卷一，〈祠廟〉，明弘治元年（1488）刻本，頁二十一上。

100 《明太祖實錄》，卷一四四，洪武十五年四月二日條，頁2262。

101 胡瑄修，李錦纂：弘治《泰安州志》，卷一，〈公署〉，明弘治元年（1488）刻本，頁十五下。

102 《明英宗實錄》，卷一三三，正統十年九月五日條，頁2643。

103 《明太宗實錄》，卷二〇五，永樂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條，頁2109–2110。

則不受此限制。例如永樂十六年（1418）明成祖修建武當山功成，選道士兩百人供灑掃，另挑選提點道士任自垣等九十人，¹⁰⁴ 使武當山道士規模至少在三百人以上。官方規定與實際狀況並不存在完全對應，如明初的陝西樓觀臺，就存在有上百人的教團規模，且非如武當山之類特殊背景的廟宇。

成化十八年（1482）明廷命官吏重修會真宮玉皇殿，泰安州學正任式撰〈重脩玉皇殿記〉：

興替靡常，所存者僅玉皇殿三間，墻基卑近，規模狹隘，人情有所未安。成化己亥（1479）冬，皇上遣中使進香帛於方嶽，行瞻是祠，從衆望，并於泰山絕頂昭真祠以聞，欲更新之。上可其奏，即下命所司，時歲在庚子也。¹⁰⁵

任式在此碑中並記：

星冠峩峩，羽衣翩翩，鴛排鷺列，口頌心言，舉手以加額者，祝聖天子於萬壽也。洗芹烹藻，酌水獻花，黃童白叟，稽首頓首，羅拜於左右者，祈斯世斯民於平康也。¹⁰⁶

引文「星冠羽衣」、「黃童白叟」皆代指道士，說明成化間會真宮道士祭祀活動仍盛。

會真宮是明代在泰山官方祭奠的場所，明初泰安州道正司所在地。而碧霞元君多為民間信仰，官府有意加以區分。會真宮建於泰安州城以內，「是宮今居州城之巽隅」，¹⁰⁷ 官府有五、六個人管香稅，入山就歸道士接管了。明代泰山道教鼎盛時一年可達八十万香

104 晁中辰：《明成祖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436。

105 任式：〈重脩玉皇殿記〉，胡瑄修，李錦纂：弘治《泰安州志》，卷六，明弘治元年（1488）刻本，頁三十五上至三十五下。

106 同上注，頁三十六上。

107 同上注，頁三十五上。

客，平均每天兩千多人，¹⁰⁸ 香客規模在繁忙的四月（其間有兩個大型宗教節日：元君生日及佛祖誕辰日）更是每天超過萬人以上。期間道士要處理施茶、建醮、儀樂、上香、次序等諸多事務，數量若不足則分身乏術。

（二）四陽庵

四陽庵位於泰山摩天嶺前的屏風岩南，隆慶四年（1571）道士柴慧庵修煉於岱東摩天嶺下之峪，建庵名潛仙庵（又名四陽庵）。先後開闢山門堂房等，在此焚修近二十年。山西參議蕭大亨禮重其人，以其院址不敞，萬曆二年（1574）前後為其移建庵宇並撰立〈柴慧庵道行碑記〉，移庵於舊基東北，形勝較舊有加。¹⁰⁹

四陽庵由於蕭大亨推崇之關係，日漸在泰山周邊聲名鵲起。道眾於其處立「第一代開山大檀越蕭公」之碑，以志其開闢道場之善跡。柴慧庵徒弟，文獻可考者有范希顏。據《范氏族譜》，希顏，字悅甫，號複齋，州庠生。據清代乾隆間殘碑見其道士數量在九人左右，可供參考。¹¹⁰

（三）遙參亭

遙參亭原為宋代在門內築亭，稱「草參亭」。明代擴建，建殿圍牆，並在殿內供奉碧霞元君，遂成為完整的庭院建築。明嘉靖元年（1522）後，更名為「遙參亭」。¹¹¹ 遙參亭雖與岱廟相鄰，但為一獨立道觀。光緒甲申（1884）〈重修遙參亭碑記〉追憶明朝當年元君

108 邱仲麟：〈明清泰山香稅新考〉，《臺大歷史學報》總第 53 期（2014 年），頁 37-132。

109 蕭大亨〈柴慧庵道行碑記〉已殘毀過半，據內文考為蕭大亨撰，碑題已失，據義擬補；另有佚名〈創建潛仙庵檀越題名記〉（即「第一代開山大檀越大司馬蕭公」碑），以上二碑今存庵址。

110 柴慧庵弟子范希顏及相關清代道士的研究，可參見張琰：〈明代高道柴慧庵考述〉，《中國道教》2021 年第 5 期，頁 52-58。

111 呂顯（1503-1566），登州知府，陝西寧州人。〈遙參亭〉詩前題跋中記：「遙參亭，舊名草參，老親參政分守時改云。」跋中之「老親參政」，指其父呂經（1475-1544），字道夫，正德三年（1508）進士，嘉靖改元，擢山東右參政。孟昭水校點集注：《岱覽校點集注》，上篇，頁 195。

祭祀熱鬧的場景：「迨明建奉元君像，而勢遂與廟離，然所以導瞻拜之誠，與夫爭先快睹之意，則一也。」¹¹²

遙參亭照妖鏡現存岱廟天貺殿。鏡中心有銘文，上面橫行四字為「東嶽泰山」，右側豎行為「天仙聖母元君殿下」；左側豎行為「草參亭內照妖寶鏡」。中間用小字落款：「大明弘治十七年（1504）八月弟子楊福宣募錢造。」可知至少在弘治年間，遙參亭就有道士住錫。

（四）關王廟

據萬曆《泰安州志》載：「關王廟隨地而是，惟在州治前者最巨麗，有司朔望瞻拜恆於斯。」¹¹³「州治前者」之關廟稱為「關聖廟」。萬曆十七年（1589），州同知張壽朋重修關聖廟，並撰碑記。萬曆三十三年（1605）吳希孔〈張志純遺世頌刻〉跋中稱：「萬曆甲午（1594）秋，會真宮災，刻無所附，余因楊道士請，移置關聖廟壁云。乙巳（1605）夏，郡人吳希孔識。」¹¹⁴跋中「楊道士」為關聖廟道士。關聖廟當時毗鄰會真宮，並非紅門關帝廟。

除城中外，泰山上之關廟亦數建，明人高誨嘉靖二年（1523）作〈游泰山記〉：「又五里至高老橋，有漢壽亭侯祠」，¹¹⁵吳同春（1544-?）在萬曆十七年（1589）〈續游泰山記〉中記：「以日晡由庵東北十餘里趨高老橋，上下山巔，無慮數四。……黃冠指點天紳泉、仙人影所在，甚辨。」¹¹⁶可知高老橋關廟有道士。

112 王價藩、王亨豫輯錄，齊煥美點校：《岱粹抄存合編》，頁 59。

113 任弘烈修，段廷選纂：萬曆《泰安州志》，卷二，萬曆三十一年（1603 年）刻本，頁十上。

114 引文為碑末小字二行，由此可知此碑舊在會真宮，明萬曆間移於關帝廟。金榮輯，陶莉、趙鵬點校：《泰山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9），下冊，頁 663。

115 查志隆：《岱史》，卷十八，〈登覽志〉，收入湯貴仁，劉慧主編：《泰山文獻集成》，第二卷，頁 235。

116 同上注，頁 255。

（五）泰安長春觀

泰安長春觀舊址即原泰安市政府院內。元代道教宗師邱處機（1148–1227）西覲成吉思汗（1162–1227）後，受命掌天下出家人眾，任便立觀居住，於是其遣弟子四方建立宮觀。元太宗八年（1236）邱處機之女弟子訾守慎至泰安修真，後州尹張郁為建長春觀，至中統二年（1261）告成，道人元和子撰碑記之。¹¹⁷ 元朝興盛的長春觀在明朝衰落，萬曆《泰安州志》載：「長春觀在州城西北隅，女道士廢絕，久之禪僧寄焉。」¹¹⁸ 若延續元代住觀道士的關係，明代長春觀應仍有女冠住錫。傳世文獻未言女冠廢絕原因，恐與永樂年間唐賽兒事件有關。

明太祖曾對女冠年齡加以限制：「又以民家多女子為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聽，未及者不許，著為令。」¹¹⁹ 建文年間，年未及五十者不得為尼及女冠，將婦女出家年齡提高到五十歲。這一規定非明朝常制，源於永樂十八年（1420）山東的唐賽兒農民起義。唐賽兒，蒲臺人林三之妻，自稱佛母，以白蓮教組織群眾。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都有信眾。永樂十八年（1420）明成祖使安遠侯柳升（1427年卒）、劉忠領兵鎮壓。唐賽兒拒絕招降，夜襲明軍陣營，殺劉忠，突圍脫險。成祖大肆收捕，但未獲唐賽兒蹤跡。「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為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詰。」¹²⁰ 後又命「悉宥罪還俗」。¹²¹ 宣德四年（1429）四月，明宣宗命遵永樂禁令：

時順天府大興縣真元觀女冠成志賢等，詣行在禮部，請給度牒。禮部言，太宗皇帝時，命尼姑皆還俗。今成志

117 元和子：〈長春觀記〉，收入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頁536；陳銘珪：《長春道教源流》（新北：廣文書局，1975年），卷五，「妙真大師訾守慎」，頁119。

118 任弘烈修，段廷選纂：萬曆《泰安州志》，卷二，萬曆三十一年（1603）刻本，頁八下。

119 《明太祖實錄》，卷八六，洪武六年十二月二日條，頁1537。

120 《明太宗實錄》，卷二二三，永樂十八年三月三十日條，頁2230。

121 同上注，卷二二三，永樂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條，頁2252。

賢等亦宜遣還父母家。上命遵先朝令，仍嚴婦女出家之禁。¹²²

成化五年（1469），「仍禁絕婦女不許為尼。」¹²³ 嘉靖年間，世宗兩次下令，將尼僧「發回改嫁」、「還俗婚配」。¹²⁴

明初長春觀可能有女冠住錫，但在永樂唐賽兒事件後，明朝政府對山東地區婦女出家限制尤嚴，至少其後一百年，在史料中沒有見到尼僧及女冠在泰山的活動蹤跡。這恐怕是長春觀「女道士廢絕」的主要原因。

（六）隱仙觀

隱仙觀位於泰安市徂徠山礮石峪。萬曆二年（1574）汶上道士于虻虛辟室於徂徠山礮石峪。隨著隱仙觀道宇漸興，遂有「徂徠第一奧區」之稱，于虻虛由是被尊為開山仙師。于虻虛徂徠後嗣創全真支派呂祖蓬萊派。¹²⁵ 萬曆二年（1572）重修三清題刻有：「山東兗州府寧陽縣東莊集劉寬、張氏、徐斐然，道人于虻虛、□□道士□□。萬曆二年三月全立。」¹²⁶ 隱仙觀除了上記「重修三清題刻」，未有明代碑刻遺存。康熙五十三年（1714）趙國麟（1673–1751）撰〈徂徠山贍田碑記〉追憶明朝相關事跡：

考開山歲事，始於前明，于仙師蟬蛻屍解，屢示異跡，固有以見其地之靈矣。數傳而至全真路羽士，路為汶上大司馬公裔，逃紛嗜寂，蒲團面壁四十餘年，弟子二三輩，春采薇蕨，秋拾橡栗，人無知者。¹²⁷

122 《明宣宗實錄》，卷五五，宣德四年六月十二日條，頁 1314。

123 《明憲宗實錄》，卷七四，成化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條，頁 1432。

124 《明世宗實錄》，卷八三，嘉靖二十二年七月一日條，頁 5405。

125 秦國帥：〈明清以來（1368–1949）泰山道派考略〉，頁 30–36。張琰：〈全真道呂祖蓬萊派及其祖廷考〉，《中國道教》2018 年第 4 期，頁 59–63。

126 摩崖題刻在徂徠山隱仙觀附近。

127 〈徂徠山礮石峪贍田碑記〉今存徂徠山隱仙觀。政協新泰市委員會編：《新泰石刻集萃》（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年），頁 35。

從碑文所記可知隱仙觀自于蜃虛開山之後，數傳至路圓守，路以面壁清修為主，弟子雖有傳承，但在明季隱仙觀規模尚在發展當中。

（七）泰安青帝觀

泰安青帝觀故址在今泰安烈士陵園紀念碑附近。周郢來信指出岱頂青帝宮和岱麓青帝觀時代相隔甚久，不宜混淆。傳說青帝主萬物發生，位屬東方，故祀於泰山。隋文帝楊堅（541–604）於開皇十五年（595）曾巡幸泰山，在泰山下設壇祭東方主生的青帝，後來在此興建青帝觀。¹²⁸ 宋太平興國九年（984）前後，乾封縣令吳某及縣尉、主簿、東嶽廟令等重修岱麓青帝觀。¹²⁹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宋真宗趙恆封禪泰山，並改乾封縣為奉符縣。宋真宗封泰山，禪社首山，詔封泰山神為「仁聖天齊王」，加青帝懿號為「廣生帝君」，御書〈青帝廣生帝君贊〉碑立於岱麓青帝觀。¹³⁰ 明弘治、正德之際，修拓岱麓青帝觀。¹³¹ 天順五年（1461）《大明一統志》將青帝觀列於「寺觀」類而非「祠廟」類，¹³² 當有道士住持。

（八）泰山玉皇閣（白鶴泉）

嘉靖元年（1522）間，泰安舉人封尚章在岱麓白鶴泉畔營造別墅，引水為池，號封家池，四方遊覽之士遂往觀焉，為岱麓勝景。至萬曆年間，於泉上建崇閣，祀玉帝，名玉皇閣。玉皇閣康熙間住持孫真清當於明末清初入閣為羽士。王獻唐（1896–1960）〈登岱筆談〉記錄為：「山下有廟，明末某真人修道於是，神化蛻留，歷數百年而完好無缺，惟面部為膺制，服紅衣，坐木龕中，揭衣而視，皮

128 馬輝主編：《泰安史話》（北京：方志出版社，2012年），頁124–125。

129 〈重修青帝觀殘碑〉，收入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頁234。《道家金石略》列於宋代，但碑石年號已殘，今據乾封縣名，定為北宋之初；又縣令廟令並列，當在太宗朝。周郢：《泰山編年通史》，頁404。

130 泰安市地方史志辦公室，泰安市電信局編：《泰安五千年大事記》（濟南：山東省地圖出版社，2001年），頁37–38。

131 汪子卿撰，周郢校證：《泰山志校證》，卷二，〈靈宇〉，頁234。

132 李賢等撰：《大明一統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上冊，頁357。

骨宛然，每一度參觀，必擲於香火錢數枚。」¹³³

（九）泰安三元宮

泰安三元宮舊址在萬仙樓西南側、盤道之西，為魯藩王府香火院。萬曆二十九年（1601）魯藩王府泰興王朱壽鏞於岱麓三元宮建一天亭，〈新建一天亭敘〉碑記：「泰嶽南麓一天門有三元宮，予府香火院也。」此碑末題：「住持徐、董美陽」。¹³⁴題名中雖僅有兩名道士，但從文中所記「羽衲雜口口卒，莫不洗心而養性於斯」、「喜無塵埃圻玄榻，時有道人來燕胥」可見當時三元宮亦有不少道士。

萬曆三十三年（1605）〈萊蕪縣進香施茶鑄石碑記〉有言：

由是弟子蘇冲氣，自幼棄俗，初入道教，晝夜諷誦皇經二十餘載。思慮未遇高人，前緣無種，預修往因，奈我無力以善勸人。今生富貴人身，皆因前世修來；現在作福，無非轉來受用；千條聖路，無過修善第一。施茶一年，眾人誠心，同名會社，各出己資，共集一處，普舍施茶。八方往來人等，濟饑渴之後，緣登山涉水。于就頂路三元宮中寓居，施茶三載，今方克備。¹³⁵

道士「蘇冲氣」在泰安三元宮中寓居，「寓居」之意表明蘇冲氣為掛單道士，故三元宮當時具備一定規模。

（十）蒿里山神祠

蒿里山在泰安城西南。成化二十二年（1486）正月，山東布政司左參議尚綱（1447-？）登岱，有〈游泰山記〉刊碑立於水簾洞（今佚）：「辛未，出城之西門，禮玉女殿，即宋天書觀。遂至蒿里山探

133 《岱粹抄存續編》，卷三，收入王價藩、王亨豫輯錄，齊煥美點校：《岱粹抄存合編》，頁110。

134 朱壽鏞：〈新建一天亭敘〉碑，《岱粹抄存續編》，卷二，收入王價藩、王亨豫輯錄，齊煥美點校：《岱粹抄存合編》，頁84-85。

135 此碑嵌於萬仙樓門洞內東壁，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立，額題「施茶碑記」4字。

鬼仙洞，令道士執燭以往，陰氣侵人，不可深入。」¹³⁶ 故成化間蒿里山已有道士。泰山岱岳區夏張鎮朱家莊全真觀現存嘉靖二十三年（1544）〈重修全真觀碑記〉中有題名：「蒿里山住持李景淵；徒楊教元、李教達、徐教貞。」¹³⁷ 天啟五年（1625）岱頂靈佑宮〈敕建泰山靈佑宮記〉碑陰題名：「蒿里山：李和成、楊沖序、張和仲。」¹³⁸ 考慮到上述兩處記載道士字輩僅有兩代，顯然不是蒿里山全部道士。

（十一）泰安火神廟

泰安火神廟供奉五行中火神的化身「火德真君南丹紀壽天尊」。廟內曾經出土過元朝的石墩及拴馬樁等部分文物，證明火神廟在元代時就有建置。萬曆《泰安州志》載：「火神廟在州之南關。」¹³⁹ 天啟間，明熹宗（1605–1627）將火神祭祀納入祀典：「辛亥，大風，揚塵四塞，命太常寺官以六月二十二日祀火德之神，著為今。」¹⁴⁰ 泰城火神廟原佔地三十餘畝，規制頗為完整，有學者認為此處在1949年以前有道士百餘人。¹⁴¹ 今廟尚存，閣已毀。

（十二）泰安天書觀

天書觀原位於泰安城西門外汶陽橋北，現已不存。弘治十六年（1503）三月，明孝宗遣領道教事、掌朝天宮事劉良輔齎香至泰山，祈靈祝壽。劉良輔〈登泰山大頂〉刊於岱廟環詠亭，末識：

弘治十六年春三月初，奉命齎香至泰山絕頂，祈靈祝壽。畢，四望遙山佳景，與塵境不侔，不愧疎陋，贅此鄙詩，以記歲月云。誥封養和體道沖玄靜默遵範崇教演法保

136 汪子卿撰，周郢校證：《泰山志校證》，卷三，〈登覽〉，頁533。

137 嘉靖二十三年（1544）立〈重修全真觀碑記〉，蒙袁明英惠贈拓本。

138 釋文錄自宗世強、朱學斌、張琨：〈泰山碧霞祠明代銅碑碑文校錄考證〉，頁16–24。

139 任弘烈修，段廷選纂：萬曆《泰安州志》，卷二，萬曆三十一年（1603）刻本，頁十二上。

140 《明熹宗實錄》，卷八，天啟元年三月九日條，頁375–376。

141 蔣鐵生：《泰山區文物資源志》（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4。

素凝虛真人、領道教事、掌朝天宮事、東吳劉良輔識。玄門法孫吳玄義立。¹⁴²

劉良輔為朝天宮道士，為中官李廣所汲引，布道內宮，廷臣嘗劾其「濫設齋醮，耗蠹國儲」。¹⁴³ 按徐溥〈胡公守法墓道碑〉，劉良輔乃弘治初掌道錄司事胡守法徒孫。可知此次奉敕齋醮活動，道教胡守法徒孫吳玄義亦有參與，並為劉良輔詩立碑。原在天書觀鑄於嘉靖元年（1522）的鐵鐘今存岱廟正陽門上，上有題名共計 205 人：「河南開封府太康、扶溝、陳留、杞縣鄉老韓學、王友、王偉、韓鉞等累年赴山東頂上天仙聖母碧霞元君進香，見天樞觀而缺鳴鐘乎，王友發心督眾，各喜舍己資，造鐘二千餘斤矣」、「山東泰安州天書觀住持道人吳玄義。」¹⁴⁴ 可知吳玄義為天書觀住持道士。

史和訓為五峰山主周玄貞弟子，由於周玄貞與周端妃聯宗，萬曆十年（1582）八月時逢皇長子朱常洛（1582–1620）降生，遂借機說帝后效「替僧」之例，將徒史和訓作為皇子替身受籙。後來常洛嗣統，史和訓由此獲一非凡身分，成為五峰洞真觀（護國隆壽宮）、泰安天書觀（天慶宮）兩處皇家香火院之住持道士。「替道」風俗亦由此開啟。¹⁴⁵ 清順治七年（1650）李雨霏撰〈重修五峰山碑記〉有載相關事跡：

……以及我大清順治己丑，相繼十三年有奇。所謂五峰山者，非真人駐節之處，實綠林盤據之藪也。至夏，有

142 劉良輔：〈登泰山大頂〉。下載自中國國家圖書館「碑帖菁華」各地 7501，檢視日期：2024 年 8 月 23 日。網址：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34&showType=1&indexName=data_418&fid=%E5%90%84%E5%9C%B07501。

143 劉良輔，胡守法徒孫，掌道錄司印。按胡守法（1416–1491），字浩然，號充庵（一號純和子），明蘇州府嘉定人。初為儒學《易》，因病入道。以校《道藏》，授神樂觀提點。天順元年（1457）擢道錄司左演法兼朝天宮住持。成化時升左正一，封真人。弘治元年（1488）授右正一，掌道錄司事。張廷玉等：《明史》，卷一八九，〈胡燿傳〉，頁 5012。

144 天書觀嘉靖元年（1522）鐵鐘銘文之前未被著錄，係泰山學院孫家鋒整理錄文並惠予。

145 周郢：《泰山編年通史》，頁 830。

縣公李父母諱維翰者，來鎮茲土，傳檄招撫，賣劍歸農，已小康矣。乃遍求史道人而雅重之，得於岱麓之天書觀。¹⁴⁶

順治己丑為順治六年（1649），知史和訓時為天書觀住持。

（十三）壺天閣玉皇殿（廟）

嘉靖九年（1530），信眾於回馬嶺下建玉皇閣，浙江按察使陳察（1482–1539）撰記碑，稱：「在嶽之回馬嶺……行次山腰，突見新祠曼碩，後有瑞仙岩，左十峰嶺，右九峰山，巉岩奇特。祠據厥勝，像設鏐沃，冠裳儼如，鐘鼓有奕，其主曰昊天玉皇上帝。」¹⁴⁷玉皇閣後稱玉皇殿，廟祀延至清末（今圯）。

萬曆四十七年（1619）竹林寺住持募修小盤路並刻石：

泰安州竹林寺住持僧人寬住，普領本州眾善人發心修路。徐勤、張氏銀一兩五錢，上山善人打柴李成等、高登進銀三錢，陳門徐氏銀三錢，玉皇閣道人王常明銀三錢，張尚智銀三錢，翟應春銀一錢，呂調元施銀一錢。石匠郭孝亮、崔玉平。萬曆四十七年（1619）三月十六日。¹⁴⁸

按泰山竹林寺與壺天閣玉皇殿之距離，此題刻中「玉皇閣」當指壺天閣玉皇殿而非岱下玉皇閣。上記中有玉皇閣道人3人。

（十四）升元觀

泰山南麓的升元觀在今山東省泰山岱宗坊西，原名建封院。宋政和八年（1118）賜額「升元」，有敕牒碑。元至元二十二年

146 《岱粹抄存續編》，卷一，收入王價藩、王亨豫輯錄，齊煥美點校：《岱粹抄存合編》，頁31。

147 陳察：〈泰山玉皇閣記〉（有引），《都御史陳虞山先生集》，卷一，萬曆四十五年陳玉陞刻兩陳公文集本，頁35–36。另有記載，見汪子卿撰，周郢校證：《泰山志校證》，卷二，〈靈宇〉，頁231–232。

148 張用衡：《泰山石刻全解》（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15），頁51。

(1285)，張志純重修，改曰「朝元」，有徐世隆碑。其神祀東華帝君，俗謂之東嶽福神。¹⁴⁹ 嘉靖二十六年（1547）道士李應奉重建升元觀，前饒陽縣知縣長清杜泰為撰記碑，稱：

聖天子……二十有六年，是為嘉靖之丁未秋八月，特遣高士陶公（引者按：仲文）以是月之十日，值萬壽聖節，奠告岱宗，為國保釐，為民祈福。事竣下山，值道左升元觀大門落成，募修道人南華郡李應奉以其工控告，將立碑紀事以侈遭逢。特許曰：汝其治之。¹⁵⁰

（十五）泰山龍泉觀（斗母觀 / 斗母宮）

泰山龍泉觀，又曰泰山斗母宮，在泰山岱陽登山盤道東側。嘉靖二十一年（1542）德府重建，濟南陳輅記石。¹⁵¹ 從斗母宮舊名為龍泉觀來看，斗母宮原來顯然為一道觀。于慎行（1545–1608）萬曆九年（1581）〈登泰山記〉仍記之為「斗母觀」。¹⁵² 泰山斗母宮後來改由尼僧住持，康熙十二年（1673）尼僧元玉撰〈斗母宮新建白衣殿記〉追憶道：「至故明天啟初年，因無真實主人看守香火，則百工俱廢，門戶蕭然。」¹⁵³ 早先的泰山斗母宮只有前後二殿、草房數間，在明天啟初年尼僧性江入住斗母宮之後，泰山斗母宮從道教性質的宮廟轉為佛教性質的尼姑庵。¹⁵⁴ 這與女性香客比例提升有關。《岱覽·分覽二》：「斗母宮，住持尼。明時皇宮替僧。」¹⁵⁵ 崇禎五年

149 聶欽：《泰山道里記》，收入湯貴仁，劉慧主編：《泰山文獻集成》，第九卷，頁42。

150 杜泰：〈大明國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升元觀重修大門之碑〉，收入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頁1287。

151 汪子卿撰，周郢校證：《泰山志校證》，卷二，〈靈宇〉，頁242。

152 查志隆：《岱史》，卷十八，〈登覽志〉，收入湯貴仁，劉慧主編：《泰山文獻集成》，第二卷，頁251。

153 袁明英主編：《泰山石刻》，第三卷，頁790。

154 朱學斌：〈明清泰山後石塢佛道興替考〉，《中國本土宗教研究》2023年第1期，頁211–219。

155 孟昭水校點集注：《岱覽校點集注》，上篇，頁369。

(1632) 三月葉承宗登岱見「斗母宮有女尼，年才十四」。¹⁵⁶

(十六) 東史村玉皇廟

東史村玉皇廟。順治五年（1648）立〈關聖帝君廟碑〉現存於肥城東疏鎮馬廟村。碑中記：「帝廟於崇禎歲泊順治而為。」末有題名：「道人真海，原在泰安州南東史村玉皇廟住。」¹⁵⁷ 可知明末東史村玉皇廟尚有道士住持。

(十七) 金山眼明殿（高真院 / 眼光殿）

金山眼光殿在泰山紅門下西南金山上，舊稱高真院。其下便是著名的岱麓青帝觀。在華北地區的民俗泛神信仰中，「眼光娘娘」是碧霞元君肋侍女仙，全稱眼光聖母惠照明目元君，又稱眼光明目元君、眼王奶奶、眼光聖母。傳說若眼睛不好，求眼光娘娘則十分靈驗。民國重修《泰安縣志·卷二·輿地志·山水》：「（眼光）殿前有眼光泉，遊人多掬水洗目。」¹⁵⁸ 隆慶三年（1569）前後，鄉人於金山上創建眼光殿（舊稱高真院，清於虎山建東眼光殿後，因與王母池眼光殿東西對峙，將此改稱西眼光殿）。¹⁵⁹

(十八) 岱嶽觀（老君堂）

明代泰山東嶽廟分為上、中、下三種：下廟即泰山南麓的泰安東嶽廟，上廟在嶽頂磨崖碑前；下廟和上廟在前文已分別分析。而中廟在半山王母池之東，舊名岱嶽觀，土名老君堂。

岱嶽觀為古東嶽中廟，是唐以前泰山最大之道觀。東晉伍緝之

156 葉承宗：《灤函·詩卷》，卷三，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3冊，頁20-21。

157 〈關聖帝君廟碑〉現立於肥城東疏鎮馬廟村，通高6.1米，為當地一絕。圖片承蒙泰山學院周郢先生提供。

158 《乾隆泰安府志2·民國重修泰安縣志》，收入鳳凰出版社編：《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南京：鳳凰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第64冊，頁286。

159 查志隆：《岱史》，卷九，〈靈宇紀〉，收入湯貴仁，劉慧主編：《泰山文獻集成》，第二卷，第108頁。

《從征記》述云：「中廟去下廟五里，屋宇又崇麗于下廟，廟東西夾澗。」¹⁶⁰ 宋代復有修葺，元後漸衰。在萬曆年間僅存三清小殿。¹⁶¹ 今僅存祀老子大殿五楹，故址即今泰安虎山中學校園。

此外還有許多明代道觀只留下了名稱而迄今未見其他相關記載，難以推斷其規模沿革，例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重修全真觀碑記〉碑中所記的諸道觀，如通道宮、靈陽宮、玉皇廟、太山行宮，皆有道士或女冠。通道宮，即元代徂徠山煉神庵周圍的東向通道觀，靈陽宮即徂徠山煉神庵周圍的滕村靈陽觀，名稱皆見於元代煉神庵摩崖題刻。

七、結語

關於寺觀數量及其修持人數的研究，作為宗教研究的歷史學方法之一，是深入瞭解道團規模、道團發展狀況、道團與政治社會關係的一個重要的視角。但已有研究或往往偏重於佛教，較少關注道教；或多考察政治中心及通都大邑，較少討論山嶽和地方，尚未能全面深入地展開。本文通過結合紙面文獻和實地考察金石材料進一步核實道廟數量、推算教團規模，並在此基礎上發掘明代泰山道教規模研究對於泰山文化（如政治文化、民間文化、宗教文化等）的獨特性或重要性，例如通過前文總結可以歸納出明代泰山道教的教團規模變遷與以下七種因素有密切關係：

（1）官方的宗教政策。 例如道正司 / 道會司先後所在的泰山「會真宮」和「岱廟（岱下東嶽廟）」對於泰山作為官方認可的全國性道教聖地起到突出作用。

（2）信仰的宗教流派。 入明以後，明太祖對正一派表現出強烈的支持意向，道錄司各級道官也大都以正一派充任，全真道士被

160 酈道元著，陳橋驛校：《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二三，頁580。

161 查志隆：《岱史》卷九，〈靈宇紀〉，收入湯貴仁，劉慧主編：《泰山文獻集成》，第二卷，第98頁。

召見和受委任者甚少。明代全真道遂分裂為諸多較小的門派各自活動，影響力難以與金元之交的鼎盛期相比。

(3) 供奉神靈的受歡迎程度。例如碧霞元君信仰逐漸比東嶽大帝信仰更受民間歡迎，長此以往相應道觀的運營也會受此影響。與性格慈愛溫柔、倍受歡迎的碧霞元君不同，氣氛相對陰冷威嚴的東嶽大帝信仰在明代持續衰落，¹⁶² 因此供奉東嶽大帝的岱頂東嶽廟的規模也隨之萎縮。

(4) 道廟的香火地多寡及供奉情況。如果一個道廟成為區域崇祀中心，影響力會遠大於周邊散落的小型道觀。

(5) 住持在當地的聲譽與威望及其師徒傳承的穩定程度。例如晉復明所在的三陽觀、柴慧庵所在的四陽庵。因為有高道傳承所以相對更有能力維持道廟運轉和團隊穩定。

(6) 道廟的選址、規模及相應配置。基礎設施的硬件對於道廟的發展很多時候起先天性的影響。交通方便的道廟更利於祭祀，例如城內關王廟。

(7) 供養人的支持力度。明代泰山成規模的道教場所按供養人影響力可以分為以下四類：**① 皇家道廟：**有不少寺觀的維修列入了欽工範圍，被皇家視為祀典場所。如東嶽廟、岱下靈應宮、岱頂碧霞祠、蒿里山森羅殿、頂上各廟等。這些被皇家所崇祀的廟宇同樣也為香客列為首祀對象。曾為萬曆皇帝鄭貴妃建醮多次的三陽觀，在民間信仰中也名聲大噪。**② 貴族道廟：**例如明代藩王周藩、魯藩等創建的後石塢元君廟、三元宮等由於有藩王背景，受到當地社會精英與地方道士的青睞。**③ 社會精英道廟：**例如四陽庵由於入祀泰安鄉賢祠的明朝後期重臣蕭大亨的資助及其名望，成為當地的名庵。**④ 民眾道廟：**例如關王廟、呂公祠、三官廟這些深受民間熱捧的道觀。

這幾個因素的相互消長，都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道廟的道士數量和相應的活動規模，當然，其中最主要的影響因素，還是統治集團的宗教政策和支持力度。例如明朝政府對於正一道和全真道的區

162 邱仲麟：〈明清泰山香稅新考〉，頁 39-40。

別對待政策。明太祖崛起於江南，在宗教上首先獲得正一道支持，因此明代在立國以後，在對待道教門派的態度上有一定的差異：對正一道教主優禮有加，而全真道則因曾與蒙元關係緊密而不那麼被重用。故明廷「代祀嶽瀆」使節的選拔專從正一道中選取。首充明代「祀嶽」之事者，即是正一道第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及其及門弟子。例如宋濂（1310–1381）〈四十二代天師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張公神道碑銘〉：

丙辰（1376）秋，上（引者按：明太祖）遣使召公（引者按：張正常），公忽先期而至，上喜曰：「卿之來何與朕意相符耶！明年之秋，朕將遣使祠海嶽諸神，卿當妙柬清修之士與其偕來。」丁巳（1377）夏，公率群弟子汪弘仁等入覲，……翼日，詔公從太師李韓公善長祠嵩山，分遣重臣與公弟子代祠群望，自公而下賜衣各二襲，楮幣有差。既還，錫燕如初。¹⁶³

明初洪武、永樂兩朝對此致祭體制一直沿用不替，宣德後方改由朝廷官員充任。明代泰山雖然以全真道為主流道教宗派，但在明初尊正一、疏全真的宗教形勢下，不排除泰山亦有正一道道士。除了常住道廟的道士之外，明代泰山還有很多火居道士和清修道士。

明代泰山的火居道士，例如泰山三義廟的徒弟、徒孫間都沒有明顯的字輩排列，恐為火居道士。其生存狀態可聯繫徐凌霄（1888–1961）和徐一士（1890–1971）著《凌霄一士隨筆》其中〈敬祀閻王廟之風俗〉記錄清代蒿里山火居道士的運營情況：「廟由道士住持，挈眷居廟旁，俗稱伙居道士，因香火之盛，收入頗不惡。」¹⁶⁴

明代泰山的清修道士為數不少，例如嘉靖四年（1525）東昌通判姚奎總巡泰山香稅，游泰山作〈游石屋記〉：「泰山東數里許，有石屋，世傳碧霞元君煉真之所。予公暇欲往觀焉。……盤旋轉一

163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頁 1241。

164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 74。

岡，而石屋在望矣。有羽士四人，癯然而迓予青松絕壑間。前牽後擁，迺獲濟焉。」¹⁶⁵ 隆慶五年（1571）道士柴慧庵修煉於岱東摩天嶺下之峪，慧庵外孫張棟在〈與蕭岳峰巡撫〉函中述此事稱：「賤子（引者按：張棟）之外大父厭薄世情，煙霞泉石，棄世業而尚玄教，遠歷五臺諸山，稅駕於岱宗之麓，結草為庵，則臺下曾為碑文，勒石以識矣。」¹⁶⁶ 雖然柴慧庵後在蕭大亨等人資助下建庵立觀，但在入岱初期，基本為散居清修道士的狀態。

對於傳統宗教團體規模的研究既富有學術價值又充滿挑戰性：一方面，其價值體現在直觀展現宗教影響力；另一方面，其挑戰性在於相關歷史資料如官方匯總數據和宗教團體實承數據的匱乏以及公開程度的不足，即便是在量化管理如此完備的當今社會，學者也不容易準確掌握目前宗教從業人員的實時數據。

有鑑於此，現今學術研究在推測宗教教團歷史上的規模以及界定發展階段時需要考慮諸如不同時段官方的宗教政策、宗教場所的數量、宗教場所新建翻修情況等不同要素：首先，宗教規模的變化要考慮到官方的宗教政策，因為這會從整體上影響到宗教的發展和走向。與此同時，縱覽歷史文獻，亦可察覺官方的宗教政策也往往會得不到地方官員認真的貫徹和執行，因而，對待官方宗教政策，我們既需要認識到它的導向性作用，又需要認真評估它的實際有效性。其次，明代泰山道教規模要通過統計道觀的數量進行判斷，而非簡單預測道士的人數，之所以如此，是與道士人數相比，道觀的數量在地方志乘（寺觀志）等傳世文獻的記錄更為清晰。

不過，在目前所見地方志所記載的道觀（基本是非常著名的道觀）數量，往往要遠遠低於實際中曾經存在的道觀數量，故此還需要進行實地的田野考察。藉由這兩方面的數據，從總體上考察不同時段內新建或翻修宗教場所的數量，或許可以看做是對官方宗教政策的真實反映；至於後續如何確定每個道觀中的人數，則又因各道

165 湯貴仁，劉慧主編：《泰山文獻集成》，第二卷，頁 234。

166 張棟：《張可庵先生書牘》，卷二，《明別集叢刊》第四輯，第 16 冊，頁 42。轉引自周郢：《泰山編年通史》，第 728 頁。

觀規模之不同而存在巨大的差異，不可一概而論。

雖然明代宗教管理相對前朝頗為有效，道教團體組織也較成熟，但道教仍與佛教有明顯區別，道教宮觀特別是較小廟觀的組織性相當鬆散，道人群體、身分並不固定，還摻雜了不少混同其他宗教教義的民間宗教乃至秘密宗教。部分道觀的道士數量能否得到進一步精確統計，道士數量能否證明道團規模等問題尚待解決。加之相關檔案材料的匱乏，因此在目前材料的基礎上對道教規模的推導仍然在不斷進取的道路。

中國古代道廟的道士數量並非固定不變，道團人數與道廟數量之間的關係也並非簡單的線性關係。在不同朝代不同時期的宗教政策、經濟情況、社會局勢等等因素也在不斷變化中。隨著日後文獻資料和石刻材料的不斷發現與公布，能納入統計的道團的道廟數量越多，則推算更能接近真實的道團規模。

引用書目

中文書目

- 上海書店出版社編：《中國地方志集成·寺觀志專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
- 《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
- 《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編委會，四川大學圖書館編：《中國野史集成續編》。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
- 方興：〈礦稅銀兩、正額稅課與晚明財政〉。《歷史研究》2023年第3期，頁201–218。
- 王宗昱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 王思任著，任遠點校：《王季重十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 王價藩、王亨豫輯錄，齊煥美點校：《岱粹抄存合編》。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
-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永瑤、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申時行等：《明會典》。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任弘烈修，段廷選纂，鄒文鬱續修，朱衣點續纂：康熙《泰安州志》。泰山王氏僅好書齋民國二十五年（1936）重刊本。
- 任弘烈修，段廷選纂：萬曆《泰安州志》。萬曆三十一年（1603）

- 刻本。
- 朱宏偉：〈《重修靈應宮碑記》考略〉。《岱宗學刊》2004年第3期，頁59-60。
- 朱學斌、張冶：〈明清泰山岱廟、全真觀、靈應宮道派傳承輯論〉。《中國道教》2022年第2期，頁64-69。
- 朱學斌：〈明清泰山後石塢佛道興替考〉。《中國本土宗教研究》2023年第1期，頁211-219。
- 吳格編：《明別集叢刊》。合肥：黃山書社，2022年。
- 《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李賢等撰：《大明一統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
- 汪子卿撰，周郢校證：《泰山志校證》。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
- 周振鶴主編，郭紅、靳潤成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明代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
- 周郢：〈新發現的徂徠山煉神庵摩崖考〉。《中國道教》2012年第3期，頁33-39。
- ：〈新發現的蕭大亨碑石敘錄〉。《泰山文化研究》2012年第4期，頁28-31。
- ：〈歷史檔案中的泰山靈應宮〉。《全真道研究》第八輯，頁28-37。濟南：齊魯書社，2019年。
- ：《泰山編年通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21年。
- ：〈《三國演義》與泰山〉。《泰山學院學報》2021年第1期，頁63-71。
- 孟昭水校點集注：《岱覽校點集注》。濟南：泰山出版社，2007年。
- 宗世強、朱學斌、張琨：〈泰山碧霞祠明代銅碑碑文校錄考證〉。《泰山學院學報》2022年第3期，頁16-24。
- 宗世強、張冶、張佳美、高凌雲：〈天書觀明代鐵塔捐修題名稀姓研究〉。《泰山學院學報》2021年第1期，頁38-42。
- 《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編：《官箴書集成》。合肥：黃山書社，1997年。
- 邱仲麟：〈明清泰山香稅新考〉。《臺大歷史學報》總第53期（2014

- 年)，頁 37-132。
- 邵珠峰：《泰山神廟劇場考》。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9 年。
- 金榮輯，陶莉、趙鵬點校：《泰山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9 年。
- 政協新泰市委員會編：《新泰石刻集萃》。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年。
- 胡瑄修，李錦纂：弘治《泰安州志》。明弘治元年（1488）刻本。
-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年。
- 晁中辰：《明成祖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
- 〈泰山山頂附中天門工程計劃書〉。《山東省建設月刊》1933 年第 3 卷第 12 期，頁 15-24。
- 泰安市文物局編：《泰山石刻大全（增訂本）》。濟南：齊魯書社，2018 年。
- 泰安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泰安歷史文化遺跡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1 年。
- 泰安市地方史志辦公室，泰安市電信局編：《泰安五千年大事記》。濟南：山東省地圖出版社，2001 年。
- 秦國帥：〈明清以來（1368-1949）泰山道派考略〉。《中國道教》2011 年第 3 期，頁 30-36。
- ：〈山東全真教的教團規模、分枝岔派與地域分佈（1368-1949）〉。《全真道研究》第三輯，頁 188-247。濟南：齊魯書社，2014 年。
- 袁明英主編：《泰山石刻》。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 逢振鏞、江奔東：《山東經濟史·古代卷》。濟南：濟南出版社，1998 年。
- 馬輝主編：《泰安史話》。北京：方志出版社，2012 年。
- 高朝英、張金棟：〈楊繼盛《自書年譜》卷考略（上）〉。《文物春秋》2011 年第 2 期，頁 61-72。

- 國家圖書館分館編，石光明、董光和、楊光輝主編：《中華山水志叢刊·山志卷2》。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
- 宿基國等：〈泰山何其高 泰山何其大〉。《泰山研究》第十七、十八合輯，頁77。泰安：泰安市泰山文化協會、岱麓書院，2009年。
- 張用衡：《泰山石刻全解》。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15年。
-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張琰：〈全真道呂祖蓬萊派及其祖廷考〉。《中國道教》2018年第4期，頁59-63。
- ：〈明代高道柴慧庵考述〉。《中國道教》2021年第5期，頁52-58。
- 曹溶輯，陶樾增訂：《學海類編》。揚州：廣陵書社，2007年。
-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 陳銘珪：《長春道教源流》。新北：廣文書局，1975年。
- 湯貴仁，劉慧主編：《泰山文獻集成》。濟南：泰山出版社，2005年。
- 萊蕪市地方史志辦公室：《萊蕪金石志》。北京：線裝書局，2017年。
- 黃彰健校勘，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實錄》。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 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臺北：新文豐，1986年。
- 葉圭綬著，王汝濤、唐敏、丁余善等注：《續山東考古錄》。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年。
- 廖元度選編，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校注：《楚風補校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 蕭協中著，趙新儒校勘：《新刻泰山小史》。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

- 趙長海校注：《王越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
- 趙衛東：〈泰山三陽觀及其與明萬曆宮廷之關係〉。《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三輯，頁280–306。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
- 趙衛東等：《山東道教碑刻集·肥城卷》。濟南：齊魯書社，2020年。
- 鳳凰出版社編：《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南京：鳳凰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
- 劉良輔：〈登泰山大頂〉。下載自中國國家圖書館「碑帖菁華」各地7501，檢視日期：2024年8月23日。網址：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34&showType=1&indexName=data_418&fid=%E5%90%84%E5%9C%B07501。
- 滕澤之著：《山東人口史》。濟南：山東省新聞出版局，1991年。
- 蔣鐵生：《泰山區文物資源志》。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年。
- 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小草齋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
-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酈道元著，陳橋驛校：《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外文書目

- Goossaert, Vincent. "Counting the Monks: The 1736–1739 Census of the Chinese Clergy." *Late Imperial China*, 21.2 (2000): 40–85.

A Study on the Magnitude of Mount Tai Taoism in Its Heyday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ZHU Xueb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ZHANG Ye

Independent Scholar

During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aoism in Mount Tai 泰山 (present-day Tai'an City, Shandong Province) faced severe restrictions due to stringent religious policies. A case in point is the thousands of extant stone inscriptions that record less than one hundred names of Taoist priests in the entire dynasty, among which not a single one from the early Ming. Between the eras of Zhengtong (1436–1449) and Zhengde (1506–1521), the religious policies of the Ming court fluctuated. The indiscriminate issuance of the certificates of ordination during the Chenghua era (1465–1487) led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aoist monks nationwide, leading to the expansion of Taoism in Mount Tai. After the 18th year of Jiajing (1539), the court stopped controlling the number of Buddhist monks and Taoist priests in society by condoning the free trade of ordination certificates of ordination. As a result, the problem of succession in many Taoist monasteries was resolved. Taoism in Mount Tai saw even greater development during the Wanli (1573–1620) and Tianqi (1621–1627) periods, with the expansion of Taoist priests in number substantially surpassed the past. During the Chongzhen period (1628–1644), Mount Tai Taoism suffered severe setbacks due to wars and natural disasters, and the situation only improved after the Qing Dynasty unified the realm.

Since no parish registers of Taoist priests and parishioners originally kept in the Ministry of Rites or local archives have survived, it is impossible to correctly estimate the number and size of the various Taoist groups active at Mount Tai during the Ming. Alternatively, this paper chooses the local gazetteers *Taishan zhi* 泰山志 (completed in the Jiajing period, 1522–1566), *Tai'an zhou zhi* 泰安州志 and *Dai shi* 岱史 (both compiled during the Wanli period) as entry points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said topic. With a wealth of documentary records of the respective periods, these sources serve as excellent samples for research into the heyday of Mount Tai Taoism. The present

study involves quantifying and deducing the scale of Taoist activity during a relatively synchronous period while also conducting comparative analyses with other stages of Taoism around Mount Tai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n addition to various chronicles found at the mountain, local gazetteers and related documen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scriptions still extant at Mount Tai, including those found on steles (on both front and back sides), tombstones, pagodas, and bronze bells, to name but a few, thereby grounding the research in both secondary and primary sources.

This comprehensive retrospect of the various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Taoist temple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offer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agnitude and nature of the Taoist schools during their flourishing period at Mount Tai.

Keywords: Taoism in Ming Dynasty, Mount Tai in Ming Dynasty, size of Taoist monasteries, bronze and stele inscriptions of Mount Tai, Taoist parishes